

中华 公益

CHINA PHILANTHROPY

2013年第2期 | 总第2期

主办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单位 南京市慈善总会

中国的民间公益时代来了
慈善机构要有社会问责意识
聚焦壹基金

袁岳：红十字会唯一出路是建立第三方评估

王石：走到公益事业台前的行动者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成立于2011年5月23日，由我国著名慈善家与企业家、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暨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基础上捐建而成，统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院系之一，同时也是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依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办学基础，同时汇聚公益、教育、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界的力量，致力于公益慈善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公益咨询、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着力促进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是我国高校首家设立的支持性公益教育研究机构。

目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已经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与博士点（DSW）下增设公益慈善研究方向，并在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增设公益慈善专业课程，同时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从事公益慈善研究工作，以培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全系列公益慈善高级专门人才。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自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开设河仁慈善工作坊，定期组织师生进行专题研讨，举办河仁慈善论坛，邀请海内外公益慈善界的专家学者与公益慈善领袖登台演讲，2012年9月22-23日与河仁慈善基金会、上海增爱基金会、江苏省慈善总会联手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京）公益事业发展论坛》等。



中华公益 CHINA PHILANTHROPY

2013年第2期 | 总第2期

主办单位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南京市慈善总会

名誉主编

曹德旺

主编

周晓虹 李杏生

副主编

陈友华 方长春 陈斌

执行主编

洪潇 周俊英 王晓雯

出版时间

2013年7月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河仁楼251室，210023

电话：025-89680964

邮箱：hrca@nju.edu.cn

网站：http://sociology.nju.edu.cn

目录 | Content

纪实 | Report

- 1 中国的民间公益时代来了
- 5 胡润慈善富豪榜：62岁黄如论成中国最慷慨慈善家
- 9 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慈善机构要有社会问责意识
- 11 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空间日益拓展

聚焦 | Focus

壹基金专题

- 13 李连杰与壹基金一起华丽转身
- 21 壹基金蜕变之路
- 28 壹基金从愁合法身份到愁钱
- 31 壹基金为何能够赢得公众信任
- 35 “为爱同行·壹基金2013健行活动”正式启动
- 36 中国平安联合壹基金启动“儿童平安”计划

观点 | View

- 37 袁岳 红十字会唯一出路是建立第三方评估
- 41 何道峰 人们不信任公益，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的公益
- 44 郝帅 刘伟 民间组织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 48 谭红波 如何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
- 49 陈友华 独立第三方监督与公益组织的成长

人物 | Figure

- 53 王石：走到公益事业台前的行动者

机构 | Organization

- 59 爱德基金会

声音 | Voice

- 65 各方言论

指数 | Index

- 67 中基透明指数FTI排行榜2013年6月8日 t o p 2 5
- 69 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 t o p 30

我们 | About Us

- 71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陈友华教授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
- 73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快讯

中国的民间公益时代来了

民间公益的时代终于到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道路仍旧艰难，有各种弊端需要克服，有无数障碍需要排除。

作者_周文生 来源_南方周末



2013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四类社会组织的申请登记将放宽；距离基金会立法整整25年。中国民间公益最迅速的成长，只在最近的短短5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场罕见的惨烈灾难，将举国的公益热情点燃，人道主义的力量更打破体制壁垒，民间公益突出重围，成为中国慈善公益的一道“分水岭”。在民间的力量中，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分析称，“企业开始直接参与救灾”是一重要特征。

雅安地震，民间公益的能量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和展现。整整五年过去，国家政策的变化、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企业灾难救助的成熟、政府单一救灾模式宣告结束，一个全新的灾难救助模式正在形成。

民间公益的时代终于到来。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道路仍旧艰难，有各种弊端需要克服，有无数障碍需要排除。民间公益的意义，远远不止慈善，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担当。什么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社会。

异军突起：企业家吹响集结号

雅安震后58分钟，国家三级救灾应

急响应启动。

几乎在地震来临的同时，民间力量已经迅速介入。地震不到半个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的救援队就已出动；在地震发生后一个小时，寻人平台上线。

当日，腾讯、联想、平安集团等24家企业就向灾区捐出善款；微博名人李承鹏在“不添乱的前提下”，组织专业救援队，迅速深入雅安；微博自发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呼吁为救援“让路”；当晚，可口可乐1300件纯净水就已送抵芦山县上里镇和中里镇……

地震后黄金72小时里，救灾情况及灾区寻亲信息被媒体滚动播放；至4月24日，有14个省市的志愿者团队120余人在壹基金救援联盟统一协调下展开救援……

支付宝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公益机构上线为雅安地震捐赠的平台。众多民间公益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芦山地震灾区，民间捐款数字直线上升。

无论是应急启动、捐款送物还是救援组织合作，此次雅安地震的民间灾难救助，显得更为及时、理性和科学。壹基金的“异军突起”，似乎更是把灾难救助带入到一个多元化时代。而企业

的公益救助在此大背景的渲染下，有了更多空间与作为。事实上，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正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其理事会有多名知名企业家参与，发起机构又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市场化企业很容易就与壹基金达成信任，平安集团、华远地产、SOHO中国、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此次捐赠的额度都较大，并同时形成救助合作协议。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雅安地震后，中国公益界的多元化需要大中小各种各样慈善组织。“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只是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但现在你不命令，我们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组织方式结合起来了。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二十年：艰难孕育，缓慢前行

从基金会得到法律认可算起，中国

公益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五年。

1988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的性质、建立条件、筹款方式、基金的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

然而，慈善公益前二十年一直发展得“不温不火”。政策不配套，理念没有转型是不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在王振耀看来，2008年以前的中国救灾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单一主导救灾的体制。每当大灾来临之时，灾难救助的责任自然地由政府所承担。从历朝历代的赈灾大员到现代四级应急响应体系的确立，救灾应急的落脚点总是政府的有关部门。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在2008年初呼吁：民间组织在大灾应急之中没有多大直接行动的阶段应该结束了！王振耀认为，直到2008那年，“慈善要素才得到全面激活”，中国企业的公益意识被彻底唤醒。

但综观过去，这一年的转折性进步也并不突然。

2001年，《基金会管理办法》的修订，首次显示出政府促进和规范慈善领域发展的诚意。

2003年“SARS”，对企业、个人等

社会力量向防治SARS 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政府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此举极大激发了民间捐助热情，最终捐赠善款接近40亿元，客观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化的进程。“SARS”背后，现代基金会在中国开始萌芽。

2004年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首次提出鼓励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意见，被视为非公募基金会的破冰性文件。自此，中国基金会行业尤其是民间基金会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到2006年，中国公益已然开始有了跃跃欲试上蹿发展的意头。这一年，慈善法草案起草完毕，《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开办法》颁布实施……每一件事都推动着慈善蓬勃向上的热情。次年慈善立法的消息更是牵动起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神经。

2008 年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颁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此意见推动央企更广泛地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并在国企中发挥表率作用。

在这些年当中，公民、公益意识在逐渐上升，草根公益组织在艰难中孕育并壮大。

2008：公益元年

2008年，多年的积累仿佛瞬间迸发，中国公益史上留下了“里程碑”。

那一年，在汶川大地震造成严重损失的同时，慈善捐助纪录被刷新。社会捐赠达到了760亿以上，抗震救灾捐赠排行榜被不同企业频频刷新，多个公司捐款超亿元。

汶川特大地震后，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达300万人以上，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1000万以上。白皮书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社区志愿者组织数达到43万个，志愿者队伍规模近亿人，其中仅共青团、民政、红十字会三大系统就比上年增加志

愿者1472万人。

但在中国公益发展的二十五年里，汶川地震灾难规模如此重大惨烈，突如其来的大灾面前，慌乱、盲目、不理性等现象难以避免。

筹集资金过程，企业出现“比捐、逼捐”现象，对于更为重要的灾后重建却很少人关注。捐款渠道的单一，导致物不能尽其用。部分企业重宣传、轻公益。

志愿者们涌入灾区，却没有做足准备，未清晰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公益理念尚不成熟，偶有不理性的声音与行为。

与此同时，当时社交媒体在中国尚未兴起，互联网反应也相对迟钝，灾区医院成主要寻人信息源。汶川地震后发生的两周时间里，负责收容伤员的各家医院电话被打爆，寻人未果的人们像发疯一样，跑遍各家医院寻找亲人。

尽管我国1998年就发布了防震减灾法，但随后十年里并未发生较大地震，该法未得到现实的充分检验，于是在汶川地震，暴露出灾后过渡性安置、灾后管理、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监管等问题。2007 年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则对于处理巨灾缺乏法律依据，解决不了地震灾害发生后遇到的大量法律问题。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司法的无序和低效，地震局、气象部门、民政部门等各个部门从单一角度认识应对自然灾害，以部门为界划分救助灾情。

汶川地震后，慈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明显完善，慈善文化建设也得到极大推进，各类媒体对慈善领域的关注和宣传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年。王振耀认为：“汶川地震社会捐赠甚至超出了政府在应急阶段的几百亿元的投入数量，民间志愿救灾的行动，更使得政府的救灾得到了多方面的配合，中国进入到了‘公益元年’。政府单一救灾的行政模型正在转化为政府与民间救灾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复合模型。”

民间倒逼改革突围

五年里，中国又经历了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彝良地震等自然灾害。在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里，中国企业的公益救助得到一次次历练，累积经验。2010年的青海省玉树地震救灾，民间应急救援显现出很大进步。民间组织已经更进一步全面行动起来，养老护理的专业队伍，成为了民间救灾的有机部分，甚至藏传佛教的神职人员，也站到了救灾行动的第一线。

政府与民间也在矛盾中不断磨合。玉树救灾，就曾出现过政府要求所有捐款都要进入政府账户的规定，但面对舆论的质疑，政府的严格规定似乎也产生了“弹性”。一个新的健康的政府与民间共赢的良性互动模式正在形成。

五年时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飞速发展，慈善捐赠高潮迭起，企业家纷纷做出表率。据2011年的捐赠数据分析，当年捐赠的57%以上来自企业，其中民营企业占57%以上。这个数据，反映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态势。

这些企业需要有一个透明的管道，让慈善捐款最终帮助到有需要的人。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NGO 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壹基金恰恰抓住了这一机会。2011年伊始，李连杰带着他的“壹基金”转嫁深圳，成为中国首个由民间发起的、具备公募基金会资格的社会组织。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中一个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迈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步伐。

更具有变革性意义的信号是，2013年两会，国务院提交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提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不过，鉴于目前关于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只有相关精神没有具体办法，各地都仍在逐步探索。

2013：新起点，新期待

五年前，人们将一笔笔善款打入红十字会的账户，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更青睐新兴民间慈善机构，NGO迅速壮大。

相对于政府，NGO的救助更注重灾区民众的特殊需求和个性化服务。使之能深入到灾区一线，提供源于灾区实际工作的第一手信息。一些企业家和明星等社会知名人士，建立起来的公益慈善机构，在灾害救助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与汶川地震相比，壹基金救援联盟不仅建了成员之间沟通信息的平台，装备也远比5年前精良，比如卫星电话、越野车、搜救犬，甚至发电机。

“由于有竞争，有公共舆论的压力、批评，无论是民办慈善机构还是官办机构表现都在进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 研究所所长邓国胜认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此次壹基金和红十字会表现都不错：壹基金在汶川地震后已建立庞大救灾网络，因此能迅速在第一时间靠近灾区的地方派遣救助队去搜救，反应速度更快了，在信息披露方面比从前做得更好。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雅安地震中，仍存在社会车辆导致“生命通道”堵塞、灾情误判、志愿者救援规则不明晰等问题，救灾过程的统一协调性明显不够。民间救援组织若能与政府应急救援体系很好结合，救援人员及物资的调配将可得到进一步优化。

这或会是另一个起点，公众有理由相信，有了理性的监督、思考与行动，各方都会朝良性的方向走。当面对灾难，国家救援体系会更完善，各方的互动合作更紧密贴合，也能留给民间力量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
([网址链接_http://www.infzm.com/content/90385](http://www.infzm.com/content/90385), 2013-5-16) ●

胡润慈善富豪榜

62岁黄如论成中国最慷慨慈善家

黄如论是连续十年进入胡润慈善榜前十名的慈善家，是十年前第一张胡润慈善榜的首善，十年来累计捐款近35亿，其中近20亿捐助教育事业。

作者_未知 来源_证券新闻中国网

中国网讯62岁的黄如论以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2013年度“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52岁的南京房地产开发商杨休以4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二；55岁的许家印以3.9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三。

平均捐赠额连续两年下降，比去年下降了45%，比前年下降了一半。

过去一年，四成企业家捐款的活动为：大学校庆、广东扶贫日、汕头市两次基金会成立，分别有10位、9位、9位。

房地产业慈善家最多，有43位，前十名中也是房地产商最多，有5位，远远高于胡润百富榜上房地产商20%的比例。

粤商和闽商是近年来最慷慨的企业家群体，分别有25人和15人上榜，而百富榜上人数最多的浙商仅以8人排名第三。从总部来看，湖北、辽宁和陕西上升最快。

黄如论、曹德旺连续十年进入胡润慈善榜，十年累计捐赠分别近35亿和50亿；许家印、朱孟依、和卢志强连续九

年进入胡润慈善榜。有18位慈善家的捐赠额超过1亿元。

平均捐赠额占他们平均财富的0.6%。

女性慈善家比去年增加4位，有14位上榜。

25%的上榜慈善家拥有政治身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于百富榜上15%的比例。

胡润慈善榜十年关键词：汶川、玉树、巴比晚宴、余彭年、曹德旺。

胡润研究院发布《2013胡润慈善榜》，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十年发布“胡润慈善榜”。《2013胡润慈善榜》以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捐赠额为统计范围。企业家若控股公司50%以上，企业捐赠计入个人捐赠数额。胡润研究院自2004年首创慈善榜以来，坚持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引领中国企业家寻找自己的慈善方向。

世纪金源的62岁的黄如论以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2013年度“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黄如论是自胡润慈善榜创榜

以来连续十年入围前十名的慈善家，十年累计捐赠近35亿；52岁的南京房地产开发商杨休以4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二；55岁的许家印以3.9亿元的捐赠额位列第三，许家印已连续九年荣登胡润慈善榜。

胡润百富创始人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虽然捐款数额下来了，但是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做的更加系统化了。”

对比去年新进入前十名

前十名中捐赠方向最多的是教育，其中75%是对大学教育的捐赠；12.5%的是对中学教育捐赠。

前十名中仍旧是闽商最多，有3位，虽然相比去年少一位；浙商和苏商紧随其后，取代去年的粤商各以2位并列排名第二。

前十名中有一半从事房地产，从事金融与投资的其次。

黄如论 过去一年共捐赠5.8亿元，成为2013年度“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2012年，黄如论向清华大学捐了3个亿，其中2亿捐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捐资1亿成立中科协安老基金，另外反哺家乡捐赠1.5亿于连江慈善基金会，用于教育。

黄如论是连续十年进入胡润慈善榜前十名的慈善家，是十年前第一张胡润慈善榜的首善，十年来累计捐款近35亿，其中近20亿捐助教育事业，除了清华大学的2个亿之外，还包括4亿捐给合肥两所学校，3亿捐给河南省文化厅建设中原文化艺术学院，2.3亿捐给福建江夏大学等，另外文化领域捐了6亿兴建福建科技馆。黄如论捐款内容覆盖助学、

扶贫、传统文化、敬老、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惠及全国多个地区。黄如论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46名，财富150亿。

杨休 过去一年共捐赠4亿元，位列第二。2012年5月，杨休在母校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捐赠4亿元，其中3亿将用于建设南大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另外1亿元将用于设立史学发展基金。今年是杨休第四次登上胡润慈善榜，历年慈善捐赠总额超过5亿元。杨休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357名，财富45亿。

许家印 过去一年共捐赠3.9亿元，位列第三。2012年6月，连续担任二届政协委员的许家印于第三次广东扶贫日捐资3.5亿用于教育事业，此笔款项已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协议，将分10年对贫困学生资助以及颁发奖学金等。许家印已连续9年荣登胡润慈善榜，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倡导企业公民理念，先后在教育、扶贫、赈灾等方面累计捐赠额已超14亿。许家印位列2012胡润百富榜第9名，财富350亿。

任元林 过去一年共捐赠2.7亿元，位列第四。2012年6月，任元林发起设立“元林慈善基金会”，以任元林在上市公司持有的10亿股每年的分红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当日首笔2.7亿元捐赠资金已到位。该基金会主要面向老年事业、科技创新及救灾帮困等公益慈善事业。

裘国根、骆奕夫妇 过去一年共捐赠2亿元，位列第五。2012年9月，裘国根夫妇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赠2亿，成为人民大学历史上获赠金额最大的捐款之一。捐款将专门用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关

村校园建设改造及金融投资学科的现代化建设。

欧宗荣 过去一年共捐赠1.18亿元，位列第六。2012年正荣集团捐资5,000万元用于建造王庄幼儿园；捐资3,500万元用于王庄社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捐资2,000万元建造莆田市民广场。欧宗荣去年位列胡润慈善榜第13位。

宗庆后、宗馥莉父女 过去一年共捐赠1.17亿元，位列第七。2012年8月，宗馥莉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7,000万元，成立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2012年6月，向中华扶贫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宗庆后是连续三届的人大代表，也是连续两年的胡润百富榜首富，去年财富800亿元。

党彦宝、边海燕夫妇 过去一年共捐赠1.11亿元，位列第八。2012年至今，党彦宝、边海燕夫妇向燕宝慈善基金会共增资1.11亿元。该基金会是2011年党彦宝与其夫人边海燕成立的，承诺十年捐资5亿元。党彦宝、边海燕夫妇去年位列胡润慈善榜第14位。

许世辉 过去一年共捐赠1.1亿元，位列第九。2013年3月，许世辉向达利集团许世辉惠安教育基金捐资1亿元。该基金会是由许世辉在2011年独立捐资成立的，主要用于奖教、奖学和助学。许世辉去年位列胡润慈善榜第16位。

杨国强、杨惠妍父女 过去一年共捐赠1.1亿元，同样位列第九。2012年6月，碧桂园捐资1亿元用于社会公益，这也是碧桂园继2010年和2011年后，连续第三次为广东扶贫日捐资。

中国特色慈善家

曹德旺 过去一年共捐赠5,000万元，位列第30名。去年是首善。曹德旺是除黄如论以外第二个连续十年进入胡润慈善榜的慈善家。2010年12月，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申请获批，成为中国当时资产规模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2011年4月，曹德旺捐出的数十亿元福耀玻璃股权正式过户。十年来曹德旺累计捐赠近50亿。

李焕明 2012年汕头“反哺工程”项目中，李焕明捐资1亿元在两英镇建设占地100亩的文化公园。他还捐资500万设立“高美学校教育基金”。

刘庭杰 锦鹏投资董事长刘庭杰既是企业家也是村官，2012年他出资1亿元建设老井新型农村社区，让全村1300多口人免费入住，致力于领导1000多口村民脱贫致富。

许晓明 根据南国置业2012年年报，“武汉闻一多基金会”成为公司五大流通股，持有南国置业股票高达1000万股。基金会所持有的南国置业股份，是公司董事长许晓明个人捐赠，他也是该基金会的副理事长。

朱孟依、朱拉伊 朱孟依发起的合生珠江教育发展基金会自2011年起捐赠11所高校共1.2亿，用于支持各高校的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等事业，2012年共计捐赠2,400万元。朱孟依的大哥朱拉伊也积极投身教育，在华南师范80周年之际捐资千万回馈母校。

吴瑞彪 2012年万利陶瓷董事长吴瑞彪1亿高调嫁女的同时也不忘做善事，婚宴上，他向晋江市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元，向漳州的慈善机构捐赠500万元。

许淑清 2008年，在许淑清的主持

下，中恒集团与中国红十字会共同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中恒博爱基金”。2012年公司共计向社会捐赠现金6,000多万。

陈丽华 一直致力于让紫檀艺术在全世界发扬光大。2012年，连续担任五届政协委员的陈丽华捐出个人收藏的珍品进行专场拍卖，所得全部注入她所发起成立的北京紫檀文化基金会，用以保护中国紫檀文化和明清家具文化。陈丽华是2013胡润全球富豪榜上的白手起家女首富，财富380亿。

华生、铁凝夫妇 他们一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作家，却捐出了东南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1,100万庆贺母校110周年的生日。

吴亚军 因离婚财产分割后，股权未超过50%而未能上榜；龙湖地产本年度共捐资1,010万元。

总体情况

《2013胡润慈善榜》上榜人数100位。平均捐赠额连续两年下降，比去年下降了45%，比前年下降了一半。上榜门槛比去年降低了34.5%，为1,100万元，是2004年300万元门槛的将近4倍。而十年间财富上升了10倍多。100位上榜慈善家共捐赠了56.5亿元；平均捐赠额5,597万元，是十年前的近3倍。

100位上榜慈善家中有58位来自《2012胡润百富榜》，其中有4位是《2012胡润百富榜》排名前十的企业家，他们是：许家印、宗庆后及其女儿宗馥莉、王健林和陈丽华。上榜慈善家的平均捐赠额占他们平均财富的0.6%，相比去年的1.3%有所下降。

有18位慈善家的捐赠额超过1亿元，

人数相比去年减少2位，比前年减少5位。

100位上榜慈善家平均年龄为53岁，与百富榜上榜企业家平均年龄相同，比去年慈善榜平均年龄大2岁。80岁的麦彦桐是榜上最年长的慈善家；29岁的孙明楠是榜上最年轻的慈善家。

100位上榜慈善家中从事房地产的最多，为43位，前十名中也是房地产商最多，有5位，远远高于百富榜上房地产商的比例。从事制造业的有17位，排名第二，从事建筑业、金融与投资 and 能源的各有9位，并列第三。

女性慈善家比去年增加4位，有14位上榜，与百富榜上女富豪比例相同：骆奕、宗馥莉、边海燕、杨惠妍、许淑清、何巧女、魏雪、赵亦澜、陈丽华、姚生娣、富海霞、许冬瑾、张茵、铁凝；其中除了许淑清、何巧女、陈丽华和张茵之外，其他都是和丈夫或者和父亲一起的名义进行捐赠的。

25%的上榜慈善家拥有政治身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高于百富榜上15%的比例。（[网址链接_http://finance.china.com.cn/money/fuhao/20130410/1377642.shtml](http://finance.china.com.cn/money/fuhao/20130410/1377642.shtml)，2013-4-10）

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 慈善机构要有社会问责意识

捐款管理是慈善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钱不是我们的，是公众捐出来的。而公众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能否把我的钱用在我所期望的目标之上。若能有效做到，大家就会满意。”

作者_张雅诗 林建杨 来源_新华社

日前，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就香港慈善机构在保证公开透明、建设公信力方面的运行管理经验发表看法。

捐款管理是慈善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钱不是我们的，是公众捐出来的。而公众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能否把我的钱用在我所期望的目标之上。若能有效做到，大家就会满意。”陈启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成立于1950年的香港红十字会是香港最具公信力、志愿者最多的慈善组织之一。

公开透明是慈善机构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就香港红十字会而言，绝大多数情况下，捐款者（匿名投入捐款箱者除外）能在捐款三个星期后，通过电话或者发邮件查到捐款走向。

陈启明表示，当香港红十字会决定展开赈灾项目时，会跟当地对口单位合作，彼此签订合作协议，除了列明捐款将用在哪些方面外，还要交待财务的管理机制，例如项目承包商或供应商要有

多家报价，并经合格工程师审批。物资派发方面，要将物资分发的方案列出给公众看。因此，不仅要交待机构准备做什么，还要交待怎样去做，之后会有审计公司去审计。

“我们定期有同事去考察。在一些重要的、决定性的步骤上，若有不妥当之处，便要及时纠正，最后再做审计，并公开披露。”陈启明说。

据了解，如果捐款数额大，香港红十字会一般会在一个月内向社会公布捐款的使用方案。即使有些捐款未动用，也会有大概的方向，并定期将捐款的使用情况及项目进度向捐款人交待，包括通过网站、工作报告等发布相关信息，让捐款人知道整个进度，而不会等到项目完结才交待。

陈启明说，公开透明固然重要，但并不足以使一家慈善机构建立起公信力，公信力的建立需要从多个方面去努力。首先是行事方式。国际红十字会有一些基本原则，包括人道、公正、独立、中立、志愿服务等，所有国家和地



香港红十字会举办的“爱心相连大行动”（左一为陈启明先生）

区的红十字会都要遵守。若要取得公众的信任，机构的管理作风和日常所作的决定，都应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其次是角色定位。“慈善机构要明白自己只是信托人，是方便志愿者工作的平台，志愿者才是主角。”陈启明解释说，信托人的概念让一个慈善机构不会误以为机构和捐款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做决定时不会纯粹依从自己喜好，而是要跟从委托人的意愿和期望。

第三，机构的管制体制是否独立和有效也是重要一环。“我们的独立，是让人觉得我们信得过的原因之一。”陈启明说。

另外，慈善机构的管制文化要有社会问责意识。既然只是信托人，一切自然要向公众交代，公开透明之余，做事也要有规章、制度，以及有效程序去监察善款运用。

还有一个方面容易被人忽略，即风险管理的安排和方案。“一家机构有错漏在所难免，最重要是公众相信这是个别事件，还是经常发生的事件。”陈启

明表示，机构在出错后是否启动交待机制、有否隐瞒、怎么去告诉大众这只是个别事件，这都影响着公众对机构的印象。

“公信力是长期积累的，一般不会因为个别负面新闻而影响机构，让形象毁于一旦。”陈启明说。

谈到一家慈善机构的行政费是否合理，陈启明表示，主要看有关比率和机构提供的服务性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没有行政费，否则一家机构的监督和平时策划工作，只能百分之百依赖志愿者，这并不现实。”陈启明说，有行政费反而是一个安全保证，是确保应有监督的必然开支。（[网址链接_](http://www.gov.cn/jrzq/2013-05/14/content_2402683.htm)http://www.gov.cn/jrzq/2013-05/14/content_2402683.htm, 2013-5-14）

中国公益慈善 发展空间日益拓展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已从原有的计划慈善向公民公益转变。

作者_陈寂 赖雨晨 来源_新华社

广东汉达康福协会有一辆流动假肢车，能开到偏远村庄，为麻风康复者现场制作、安装假肢。这个慈善组织眼下想给100名康复者制作假肢，他们需要募款25万元。

协会带着这个名为“行，成于爱”的流动假肢支持项目日前参与了广州市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除此之外，还有百余家慈善组织在进行推介，项目包括为独居空巢老人提供生活服务、帮助残疾人就业、资助外来工留守儿童上学等，多的筹款数千万元，最少的项目只需1000元资助。

这个慈善“卖场”的全部1080个慈善项目，主要集中在扶老、助残、济困、救孤、赈灾等领域，由社会热心企业和人士自由选择、定向捐赠。

“在整个活动中，政府饰演组织发动、宣传引导、审核把关的‘搭台’角色，将‘主角’交给了慈善组织、热心企业和个人。”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告诉记者，27日闭幕的慈善项目推

介会，共募集了3.187亿元资金。

事实上，在打破“政府募捐办事、公众出钱”的慈善模式之前，广州市在公益慈善事业上已经有许多“去行政化”与“简政放权”的努力。

去年5月，首部放开慈善公益组织公募权的地方法规《广州市募捐条例》正式实施，破除了公办慈善机构在慈善募捐中的“专权”，为民间慈善组织提供了与公办慈善组织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制度上鼓励民间慈善发展。广州市包括公益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用前置审批，也无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政府希望官方和社团分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作用，调动积极性，为社会办更多事情。我们几个刚退休的老人决定抓住这个契机，顺应潮流积极做一些事情。”池朝兴老人告诉记者，他和几位同样退休的好友在去年8月成立了广州公益组织发展合作促进会，希望利用“余热”为残障人士平等就业提供慈善帮助。



广州市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

今年“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救灾捐赠机构，支持那些专业高效透明的慈善机构。

“民政部门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成为监管者和立法者。”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告诉记者。在职员工不到40人的壹基金，在此次地震救灾中获得600多万人捐款，金额达到约3亿元。

杨鹏认为，社会领域的逐步开放会促进国家公共建设成长，民间慈善也应该纳入其中来思考。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27日发布的《中国公益发展报告（2012）》指出，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已从原有的计划慈善向公民公益转变。“它试图超越以往国家主义的计划慈善和纯粹个人的施舍行为，而走向以公民为主体、以社群为基础的公益慈善。”

“公益慈善组织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从行政化到社会化。”中山大学中国

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告诉记者。

“一旦放开了，公益慈善组织自由竞争，公民公益的自然选择生态就出现了。每个人的爱心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训练。”杨鹏说。

在朱健刚看来，现代慈善的本质也正是公民公益，强调公益慈善是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礼物交换。“正因为这种礼物交换，公益才能使公益人可以在奉献社会、服务人群的同时，自身也得到很多非物质的收获和成长。”
([网址链接_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6/28/c_1116332621.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6/28/c_1116332621.htm), 2013-6-28)

李连杰与壹基金一起华丽转身

作者_未知 来源_中国时刻网

李连杰渐渐意识到，壹基金要想可持续发展，去“李连杰化”是必然选择。对于李连杰个人而言，公募化是把重担分摊给一群最聪明的人来共担。而这一群最聪明的人，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周惟彦、柳传志和王石、冯仑以及杨鹏。

今年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发生了7.0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发起了爱心行动，向灾区捐款捐物，而壹基金是此次民众选择捐赠的一个重要渠道。截至5月6日，壹基金共收到近300万人次捐款，捐赠总额近2.6亿元人民币。芦山地震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众形象有多“黑”，壹基金的公众形象就有多“红”。二者品牌形象反差巨大。有人惊呼：“壹基金爆发了！”创始人李连杰当初制定的口号“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看起来已然实现；壹基金的透明和专业，也得到公众认可。

但壹基金内部显然并没那么欢呼雀跃。5月7日，壹基金在北京召开一届七次理事会，专题讨论芦山地震救灾的行动计划。他们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李连杰在微博上用“像抱着一枚炸弹”来描述捐赠者的信任所带来的压力。

一路走来，尽管众多商界、学界大佬教会了李连杰许多本事，但壹基金仍走的磕磕绊绊。对于如今的壹基金，在溢美与追捧之后，揭“短”质疑的负面评论也很汹涌。很多人认为，解决了身份问题的壹基金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从2007年4月“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以来，壹基金已经走过整整六年。前三年半，李连杰亲力亲为，用强大愿力令壹基金在短时间内成为家喻户晓的公益机构；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启动，壹基金成为一家公募基金会，从此不再姓“李”。对此，李连杰表示，这是他一直的心愿。因为一个长久、持续、专业、透明的基金会，不能只在李连杰的名字下。”

公募化之前，李连杰作为壹基金的创始人，扮演着类似企业CEO的角色，全身心投入壹基金的管理中。在公众看来，从2004年末发愿做慈善开始，至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公募化成功，期间六年，李连杰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用他自己的话说，壹基金头三年的合作伙伴，起码有80%的企业是他一个个亲自谈下来的。有人评价这一时期的李连杰为，“把前半生的人脉都用尽了”。而李连杰渐渐意识到，壹基金要想可持续发展，去“李连杰化”是必然

选择。所以他一直积极寻求公募化。对于李连杰个人而言，公募化是把重担分摊给一群最聪明的人来共担。

而这一群最聪明的人，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些名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周惟彦、柳传志和王石、冯仑以及杨鹏。这些大佬级人物，从一开始就活跃在李连杰左右。壹基金的成长历程，也与他们息息相关。

在深圳壹基金注册成立之前，理事会成员便已全部确定下来。最早确定加盟壹基金的大佬是冯仑，之前他就跟李连杰私交甚好。冯仑就壹基金高层组织架构方面给李连杰支招。

一个月以后，在冯仑的介绍下，李连杰与王石在北京的一个比较私密的会所见面。不过，那天谈得最投机的并不是壹基金，而是两人当年闯深圳的经历。据杨鹏透露，当时李连杰特别要注意把王石拉进来，并想让王石来管理壹基金。李连杰看中王石的两个特点，一个是管企业管得好；二是王石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有公益组织的管理经验。最终，李连杰如愿以偿，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王石一直在担任执行理事长，具体负责壹基金的重大决策。

王石进来以后，推荐了当时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秘书长的杨鹏加入并任秘书长。杨鹏曾任中国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有政府工作经验，与王石“有过合作也都比较了解”。因为李连杰也是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柳传志是企业家俱乐部的主席，柳传志加入壹基金并没有太多的波折。

选择周其仁为法人代表是杨鹏的主意，而说服工作是由之前便与周其仁相识的王石完成的。周其仁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不太愿意接受公开露面的事，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合适，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他特别合适。”最后，周其仁碍于朋友的面子，加入进来。

据李连杰回忆，李连杰最难的时候，经常找马蔚华吃饭，马蔚华都在招商银行顶层招待他，一起吃员工餐。壹基金成立后，马蔚华向李连杰传授不少管理经验，招商银行的年轻员工比较多，他就把自己跟年轻人沟通的经验教给李连杰：必须要用心，要把这个机构所有年轻人的词汇都掌握，到支行必须干三件事，跟中层干部吃饭，所有员工都讲一次话，搞一次集体活动。

李连杰和马云经常会面的地点是在杭州马云家大别墅的院子里。和李连杰第一次见面，马云就建议李连杰，要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做，而不是一下子扯一个大企业，把自己架上去。阿里巴巴为中小企业服务，所以马云特别重视公正和平等。他觉得做公益的出发点，是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这本身没有任何道德上面的优越。马云告诉李连杰，“所有我们任何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一个普通的人能不能做到。如果他做不到，你就不应该把这个当成一个要求。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不是理性、可持续的。”

每次理事会，除了柳传志和牛根生派代表参加，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他大佬都亲自参加会议。尽管大佬们很支持，但在和大佬们的企业合作的时候，却依然没有后门可走，跟正常的商务合作并无二致。指教归指教，生意归生意。大佬谈大佬的，合作还得基层的工作人员谈，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还得董事局通过，像正常的商业合作一样，要遵守商业规则。

壹基金在和招商银行商议共同推出一个壹基金月捐信用卡的时候，预算、项目设计、发卡量，都要经过合规的程序，招商银行直接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要看到实在的效益才会和壹基金合作。而由刘东华等媒体人和政府负责人组成的监事会也是深圳壹基金背后强有力的支持。在一次理事会上，监事会提出在重大突发事件收到很多捐款，要即刻启动同步的审计，深圳壹基金监事会



成员、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表示，“条例没有要求审计，只是信息公开，我们进一步要求审计，并同步审计，这个是为了让它更加公开公平，这个意思就是公募基金会要给公众捐款人有交代。”

有人说，在中国做慈善，本来就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何况还是在现在这个诚信缺失的时代。壹基金能在其中脱颖而出，实属不易，除了李连杰的个人魅力，还有其一直以来对捐款的透明管理。汶川地震是壹基金募捐的爆发点，截止2008年5月19日中午12点，短短7天之内，就筹到了善款4272.6万元。李连杰连夜带着善款奔赴成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200万元我们自己操作，四千多万交由红十字会支配，毕竟这方面红十字会更能从全局把握。”也就是说壹基金自己只支配善款的4.6%，剩下的则是交给红十字会官方支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壹基金工作人员说，壹基金只负责筹钱，并不负责管钱，对捐款的使用，必须通过红十字会的财务渠道进行。所以，取得独立合法的公募身份，成了壹基金的当务之急。

李连杰的壹基金是中国私募基金的一个缩影。中国的私募基金一般必须要挂靠在一个公募基金会或者主管部门的名下，否则不能公开募集善款。而中国现有的公募基金会，有的仿佛成了政府外派的筹款机构。据调查，汶川地震募得的760亿救灾款，有大半进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不少善款的去向，便由政府全权调拨，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所以，壹基金出身民间的身份，能够激活公募基金的公益力量，划清慈善行为与政府责任的界线，让善款用到最该用的地方。

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的壹基金最头疼的问题。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级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但当时的李连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众募款的基金会，政策上面临不小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导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与公募基金会身份无缘。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尽管没有明文限制民间人士申请



注册公募基金会，但根据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公募基金会的登记注册管理及日常性管理，都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制。具体而言，壹基金要成为公募基金，就必须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并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而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只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才能担当。

这样的规定，似乎没有将壹基金的路堵死。但多年以来，民间公募基金几乎无稽可考。后来帮助壹基金“落户”、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现任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的刘润华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意味着，民间要发起成立社会组织，就要找一个政府机关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每个政府机关都会琢磨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当你的业务主管单位，万一你出事了，我怎么办？显然，不当业务主管单位是没有责任的，当了就有责任。当的业务主管单位越多，责任越大。那么，最理想的抉

择就是不当业务主管单位。制度设计这样，一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壹基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差点夭折，但幸运的是，它最终在众多寻求成立公募基金会的民间组织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来。

2007年4月19日，申请公募基金受阻的李连杰，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在红会内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合作期限3年。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鉴红会的工作制度和标准。从如何接收物资，到跟志愿者签什么样的协议，再到物资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红会学习。但是他们也发现很多东西适用不了。同时，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壹基金计划没有独立账户，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进入红会总会的账户，这导致其在公益项目的执行上面临很多障碍。例如，壹基金计划在对外签署合作协议时，必须经由红会签字批准且加盖红会的专用章方能生效，手续和流程十分繁琐。一旦某位领导出差无法签字盖章，

壹基金计划就不得不暂缓各种项目合同的签署实施。

为了减少实践中的困难。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希望能够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公募基金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所以只能申请成立私募基金会。当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请，两个多月就出了结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从此，壹基金计划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公募权的壹基金计划负责筹集善款，然后拨付给具有独立执行权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执行对外资助的公益活动。

然而，这让壹基金与上海市民政局、红会的相处关系越来越尴尬。很多人也对以私募身份运作公募身份募捐善款的行为提出质疑。“两方都觉得这个事情和模式不符合，上海方面说一个非公募基金会老来做公募的事，然后也不一直在上海做，做的都是全国的。红会说你做的已经超过红会的工作范围了，我怎么批你这个项目？”唐艺蕾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道。

那时候，李连杰和他的团队已经意识到，长久之计还是取得独立的公募权，即将壹基金独立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这几年，李连杰越发显得“不务正业”。尽管这个“功夫皇帝”还时不时奉上一两部电影作品，以宽慰翘首企盼的影迷们，但他更乐意分享的是壹基金慈善事业。

除了在大灾难中挺身而出，壹基金在关注儿童方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2010年6月，中国第一部以自闭症为题材的电影《海洋天堂》上映，由李连杰和文章主演，正是这部作品，引发了社会对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处境的高度关注。

在这部电影中，李连杰只拿了一块钱的片酬。2011年11月8日，“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华南地区自闭症儿童关爱救助项目”在深圳地王大厦启动。自此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启动，全国103家特殊儿童服务机构参与其中，受益儿童超过1万名。而此后，壹基金关爱自闭症儿童的蓝色行动年年举行，在业内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2012年冬天，壹基金针对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的严酷生活困境，发起社会各界捐赠“壹基金温暖包”行动，以解决凝冻灾区和西部高寒山区儿童御寒物资特别缺乏，过冬衣物、条件和设备均不足的问题，帮助10省22万多名受凝冻灾害影响的儿童、孤儿和失依儿童。

壹基金是由李连杰于2007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在中国大陆，壹基金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架构下设立，是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壹基金的宗旨是：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灾害救助活动，壹基金还会定期举办各种公益活动，比如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大型倡导活动——“蓝色行动”；一直在进行的“壹基金净水计划”和向灾区儿童发放的“壹基金温暖包”等。另外壹基金也联合各地合作伙伴，及网络等媒体进行防患抗灾的各种地面活动，向民众尤其是儿童普及灾难逃生知识。

救灾一直是壹基金致力的重要领域之一，自2007年4月成立以来，壹基金先后针对云南普洱地震、2008年南方特大雪灾、山东洪灾、汶川地震等多起自然灾害进行了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将救援之手伸出国门，作为中国第一个对灾情做出反应的民间公益组织，对缅甸风灾及意大利地震给予了资金及物资援助。壹基金不仅在灾难发生时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提供生存必须的紧急物资援助，同时针对重大灾难，整合多方资源进行



壹基金在深圳市民政局成功注册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

积极、长期的灾后重建工作。

壹基金计划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个人的壹基金团队开始了救灾工作。当时，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时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团队只能在现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租的房子里办公。

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收到了1.2亿元的捐款，送出了无数个物资包裹。红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壹基金这是一个婴儿在做大人的事。由于壹基金在公益事业中做出的突出成绩，特别是在5.12汶川地震中的重要表现，壹基金在2008年底荣获了由国家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

据悉，壹基金救援联盟自成立至今，参与过广西柳州水灾、玉树地震及云南抗旱、江西水灾、盈江地震、新疆地震、721北京特大自然灾害等多项公益救援行动。在2009年，救援联盟组织参

与救灾、救援行动27次，400余人次参与救援；2010年，联盟组织参与协助政府的救灾行动7次，820人次参与救援；2011年，执行救援行动46次，1011人次参与救援；2012年1月至8月，执行救援和救灾行动24次，336人次参与工作。

在2012年，由于我国中西部的降雨频繁，汛情严峻。多条支流出现超警戒洪水，多地山区暴雨引发泥石流、洪涝等灾害。壹基金联合12省区民间组织开展救灾行动，关注灾害最脆弱和最易被忽视的群体——儿童的需求，搭建民间公益参与洪灾救援的平台，第一时间到达灾区。通过在国际人道主义赈灾标准中的水与环境卫生、生活与学习物资及心理支持等三个技术领域开展工作，主要包括儿童专用救灾物资——壹基金温暖包、帐篷，建设儿童友好空间、壹乐园等，为受洪灾影响的儿童提供援助，缓解灾害对儿童的造成影响。同时联合媒体，共同推动公众关注洪涝灾害，帮

助灾区儿童。

而在今年的雅安地震中，壹基金不仅获得的捐款远胜于红十字会，更博得了好名声。据悉，在雅安地震中，壹基金获得了3亿多的现金和物资捐款，来自企业的捐款占到52%，个人占48%。在总共297万人次的捐款中，来自淘宝的捐款就达到200多万人次。对于这一数字，李连杰很是高兴，他说：“人次是壹基金的命根子”，他不仅仅看重捐款的多少，更看重参与人数，他认为这才符合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目标。

而在背后，成就壹基金200多万人次捐款的是互联网平台。2011年，其获得的捐款仅1亿多元。2012年上半年获得的捐赠收入是1926万元，其中通过银行汇款捐赠占比56%，现金捐赠1%，招行信用卡13%，招行借记卡5%，支付宝6%，财付通11%，深圳银联2%。从这一比例看出，互联网已经成为其重要捐赠渠道。

对于壹基金来说，深圳是个宝地。2011年11月之前，李连杰为了让壹基金独立合法化，想尽了办法，甚至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就有了帮助壹基金“落户”深圳的想法。在他看来，把深圳打造成公益慈善之都，全国有这样的形势，深圳有这样的条件。

壹基金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注册申请。壹基金的秘书长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历经多年的磨难之后，李连杰的壹基金终于转正，有媒体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李连杰自己也感叹地说，从2005年筹备“壹基金”以来，一直困难重重，到处求人。“求”明星帮忙参加，“求”媒体宣传慈善理

念等等，李连杰说：“我自己心中定位的我，是一个乞丐，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乞丐。有人说我是装孙子，我不是装孙子，我是真孙子。”

壹基金的独立，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合法的公募身份，也是国家民政部门积极推进社会慈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一步。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

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而在国外，公益基金的薪酬跟商业公司比较趋近，因为他们同样需要管理大量的资金，而且公益基金需要的能力与付出，甚至比商业公司还高。以比尔·盖茨基金会为例，他们的中层月薪收入在2.5万~3万美元左右。

据杨鹏介绍说，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就行了。正如同美国主流的基金会，主要职责就是钱的整合，不执行具体的项目。未来，壹基金也会往“民间组织的财政部”的方向发展，“很多场合我们有点像一个蓄水池，公众的捐赠到了我们这儿，就像我们又从蓄水池分出了很多水渠，又到了草根组织那儿去，为更多的机构拓展更大的空间。”

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在许多知名的国际组织中，绿色和平就是像壹基金这样承担着执行任务的机构，其运营成本高达70%，这几乎是中国规则的六七倍。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

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以救灾部门为例，整个部门只有7个人，却要把200多家机构管起来，平均每个人盯几十个合作项目。

中国式慈善发展到今天，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政府和公益组织的相互边界是清楚的，但这并不等于两者之间不会出现交叉碰撞。而如何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领域的角色定位更加清晰，是慈善发展的方向。正如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所言，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实现资源共享，才能共同推动社会事业的发展，才会还原慈善本来的面目。在现在基金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基金会应该找到自己的专业定位，提高辨识度。增加公信度和透明度也许是中国慈善的走向，而民间基金会或者说专业基金会才是中国慈善的基石。

一个好的信号是，目前，中国的慈善正呈现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原来的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现在要做的，是给慈善更开放的空间，虽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在民众的监督和市场的自我淘汰机制下，相信慈善事业也会越来越规范。总有一天，老百姓不看别的，只认专业、透明、高效。捐助人仅为高效的慈善埋单。[网址链接](http://www.s1979.com/young/reushi/201306/0590038505_5.shtml)http://www.s1979.com/young/reushi/201306/0590038505_5.shtml, 2013-6-5) 

壹基金蜕变之路

作者_张泉翔 冯昭 来源_慈讯网

芦山地震发生后的16天内(截至5月6日),壹基金共收到近300万人次捐款,捐赠总额近2.6亿元人民币。芦山地震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众形象有多“黑”,壹基金的公众形象就有多“红”。二者品牌形象之反差,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有人惊呼:“壹基金爆发了!”创始人李连杰当初制定的口号“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看起来已然实现;壹基金的透明和专业,也得到公众认可。

但壹基金内部显然并没那么欢呼雀跃。5月7日,壹基金在北京召开一届七次理事会,专题讨论芦山地震救灾的行动计划。他们有一种如履薄冰之感。

“像抱着一枚炸弹。”李连杰在微博上如此描述捐赠者的信任所带来的压力。

“每分钱都是一种责任,每分钱都是一种压力。”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坦言。

毕竟,壹基金只有39名专职人员,2012年上半年,它只筹集到1900多万元善款。自从2011年壹基金完成公募化转型并“去李连杰化”后,壹基金似乎一度被公众遗忘。如果不是芦山地震期间的爆发,这家机构可能还在继续平衡“去李连杰化”后的心理落差。

芦山地震期间,此前一度声称自己只是壹基金“志愿者”的李连杰,在微博上频频发力,呼吁大家参与救灾。他的号召力,是壹基金爆发的重要推动力。

从2007年4月“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北京正式启动以来,壹基金已经走过整整六年。前三年半,李连杰亲力亲为,用强大愿力令壹基金在短时间内成为家喻户晓的公益机构;其后,在实现公募化的同时,李连杰选择了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多位国内主流企业家担任理事的新型管理架构。

在度过了两年多“去李连杰化”的低迷期后,芦山地震期间公众对壹基金的鼎力支持,真正宣告了壹基金2.0时代的到来。

壹基金由1.0向2.0蜕变的故事值得被观察、被记录,是由于它属于这样一个案例:一个由明星发起的公益机构,当明星发起人不再是主要驱动力时,什么样的专业发展方向,可以将它带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一个人的战斗

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式启动,壹基金成为一家公募基金会,从此不再姓“李”。李连杰说:“‘去李连杰化’是我一直的心愿,因

为一个长久、持续、专业、透明的基金会,不能只在李连杰的名字下。”

公募化之前,李连杰作为壹基金的创始人,扮演着类似企业CEO的角色,全身心投入壹基金的管理中。在公众看来,从2004年末发愿做慈善开始,至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公募化成功,期间整整六年,李连杰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

“40岁前,我有一个清晰目标。我要赚钱,要证明自己的才华、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但2004年那场印尼海啸,差点夺走了李连杰和他家人的生命。面对死亡,他意识到,物质、金钱都不能解决人生的痛苦。已是一个佛教徒的李连杰决定,40岁后的人生要做慈善,帮助他人减少痛苦。

他想到要做一个跨宗教、跨政治、跨文化的基金。2005年,李连杰将自己此前在美国设立的一个基金会更名为壹基金,主张每人每月拿出1块钱来帮助他人。

接下来的两年,李连杰带着一名助理,花费几十万元,走访了美国、加拿大、中东、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大陆,调查各地的基金怎么做。在美国,李连杰曾一个月内访问了20多个城市。“那两年比拍戏20年还辛苦。”李连杰坦言。

亲自做调查的同时,李连杰还找到美国一家专业咨询公司,对中国的慈善捐赠进行调研。

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在大陆成立壹基金做准备。

2006年12月,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首映式上,李连杰首次对外公布将携手中国红十字会设立壹基金,致力于灾难救助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援助。此前,李连杰壹基金已与红十字会就合作事宜探讨了一年半之久,终获批准。

2007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下属

的慈善专项开始运作。

2008年10月,为保证公益项目更高效地实施,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成为红十字会“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

在决定创立壹基金后,李连杰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有点像个体户,一个人满腔热情创业;第二年的壹基金则逐渐成为一个集体,专业的朋友们一起把壹基金建立起来;第三年的壹基金应当是一个公募基金会。第一年要叫李连杰,因为可以省广告费。第二年再推,引起社会更多关注。第三年去李连杰化,只剩壹基金。”

壹基金成立后的三年中,李连杰全力投入其间,只要向壹基金捐赠超过100万,他就会出现在该企业的活动现场。

“头三年,你可以问问所有团队成员,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从企业角度讲就是首席执行官,运营上的大小事情,全都亲力亲为。壹基金头三年的合作伙伴,不说100%吧,起码有80%的企业是我一个个亲自谈下来的。没人了解那种辛苦。”李连杰说。有人评价这一时期的李连杰为,“把前半生的人脉都用尽了”。

而在此时期,壹基金一直坚持做平台型基金会,基金会执行主席是周惟彦——一位以市场营销见长的上海籍女性。她最大限度地借助李连杰的明星形象,利用现代的传播手段,把壹基金推介出去。

李连杰意识到,壹基金要想可持续发展,去“李连杰化”是必然选择。所以他一直积极寻求公募化。对于李连杰个人而言,公募化是把重担分摊给一群最聪明的人来共担。

2011年1月11日,壹基金公募基金会在深圳揭幕挂牌。此后,壹基金的性质从平台型基金会向项目型基金会转型。

一群名流的公益理想

壹基金项目化的战略转型,源于治

理结构的转型——从中国红十字会下面的一个“计划”，转型成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而这又与其“超豪华”的发起理事团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王石、马云、马化腾、周其仁这些商业精英、学术领袖，是如何被吸引到壹基金的？

2007年12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时任《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将李连杰带到中国大饭店举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现场，使其首次与企业界领袖及学术界精英建立了接触。

起初，李连杰的出现让大家十分惊奇，有的人甚至很不解，但李连杰很快就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赢得了企业家们的欣赏和信任。“我记得他介绍起壹基金时非常激动。我对他很有好感，也很感兴趣。”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回忆说。

这次会晤仅五个月后，5·12汶川地震期间，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和淘宝、马化腾领导的腾讯，就作为战略合作伙伴，第一时间为壹基金开通了捐助平台。一年之后，马蔚华领导的招商银行和壹基金合作推出爱心信用卡，消费者每办一张卡向壹基金捐款一块钱，每消费一次向壹基金捐款一分钱。牛根生则通过老牛基金会与壹基金合作，对其给予多方面帮助。

“早期对壹基金帮助最大的主要是‘三马一牛’。”杨鹏说。“三马一牛”，即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四位企业家。通过与上述企业家的合作，壹基金与其所领导的企业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仅汶川地震一项，阿里巴巴、招商银行、腾讯、老牛基金会，每家对壹基金的支持都不少于2000万元，几乎占了全部善款的70%。

刘东华对李连杰的评价是：“他是个真人。他是个想做大事的人。他是个思维健全、能把大事做成的人。”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中，王石、冯仑对李连杰所描述的“人人公

益”这一理念也颇为认同，但他们都在另一家集合了众多企业家的公益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况且，民间非公募基金会的公募化运作，在中国极少有先例可循。因此，王石、冯仑并没有完全确认加盟壹基金的意愿，而是委托时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前秘书长、专家委员会主席杨鹏进行研究。

“我觉得这件事挺值得做。第一，这个事很纯；第二，意义很大；第三，困难很多。我跟王石说，你们这些有条件的人都不帮他，那谁帮他？那时候，大家都挺理想主义，既然让人感动又值得干，困难再多也要把局面撑起来。”杨鹏告诉《中国慈善家》，“那段时间，李连杰的头发都熬白了。”

2010年2月，包括李连杰、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周惟彦、柳传志和王石、冯仑、杨鹏在内的筹备组成员聚在一起，就壹基金公募化路径进行了一次讨论。王石戏称，“三马一牛”变成了“五马奔腾”——如果将冯仑比作“二马”的话。

都是大佬，由谁来领衔管理？“连杰比较中意的是王石。”杨鹏说，“他有几个理由：第一，王石的管理能力是公认的；第二，王石有正直的口碑；第三，王石有鲜明的个性，年轻人比较喜欢。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他企业家都忙得要死，但王石比较懂得放权，看重缓慢、持续的进步，所以他有时间去思考、爬山、去哈佛读书。”

就这样，以王石为组长、杨鹏为秘书组负责人的公募化之路开始了。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在中国大陆，独立的公募基金由政府部门独立操办，并享受事业单位编制。民间资本的公募化运作虽然也出现过，例如宁波市抗癌健康基金会，但往往是在打“擦边球”，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存在着立法空白。因此，当壹基金这样一个在全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公益组织申请独立的公募化运作



2012壹基金公益映像节正式启动

时，没人敢于接招，筹备组的工作接连几个月都没有进展。

公募化破冰

在公募化前途未卜之际，旧的运作机制仍要维系。当时的流程是，“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善款先进入中国红十字会账户，审核后才能拿给上海壹基金去执行。账户不能自主，中间难免有磕磕绊绊。于是就有了李连杰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突然说“壹基金有中断的可能”这一幕。

李连杰这一表态，不仅引起了社会喧哗，也捅破了中国民间慈善中的一层窗户纸。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现有的登记管理体制。而在此领域，深圳市是有“尚方宝剑”的一早在2006年，深圳就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开始了尝试性探索；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把体制创新扩展到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领域；2009年，

民政部直接与深圳市政府签署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

有了政策保障，刘润华主动联系到与壹基金关系密切的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研究院（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通过其向李连杰递出了邀请壹基金到深圳落户的橄榄枝。“壹基金有两个人专程来找过我，一个是杨鹏，跟我谈壹基金注册的细节问题。我说没有细节，只有大局。壹基金落户深圳这是大局，一切细节都要让路。”刘润华说，“第二个来找我的是王石。他是我们深圳的企业家，知道我们的态度后，他连说了三句‘灯下黑’。”

随后，刘润华给民政部写了一封关于壹基金落户深圳的汇报信，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给他回复短信：“感觉很好”，“高度共识，共同奋斗”。“我们登记壹基金，完全是在法规和政策的框架下进行，只是打破了一些工作惯例。可以说是做了一件既该做、又能做的小事。”刘润华告诉《中国慈善



李连杰壹基金纪念邮票发布仪式

家》。

实际上，上海市民政局也曾向李连杰表示过“先从地方落地”的合作意向。但李连杰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深圳。他考虑到，壹基金有三位理事在深圳，壹基金落户深圳，从人员、资源分配上都有利。“这件事有点机缘聚合，前后十多天的时间就办完了。”杨鹏说，“这个过程中，我还得筹集老牛基金会、上海壹基金、万通公益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5000万元的注册资金。”

这是一次被李连杰比喻为“先入洞房，其他事再说”的落户，因此，注册之后仍有许多细节需要商榷。比如，在理事会最初拟订的章程中，李连杰被注明为“永久理事”，但作为一个公募基金会，这一表述无法通过政府的审核。“为此，我们的章程差不多晚公布了一年半。”杨鹏说。最终，理事会章程只能将李连杰的身份表述为“发起人的权利”，“永久理事”则成为名誉上的称谓。

接下来是理事长的推选。壹基金作为一个大众化组织，由企业家领衔似乎并不合适。于是，王石向李连杰推荐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他是一个受大家尊敬的经济学家，身份比较中立。”杨鹏说，治学严谨、为人低调的周其仁最终同意了筹备组的邀请，担任壹基金的理事长和法人。

公募化后，杨鹏担任壹基金秘书长。作为一个学者型管理者，杨鹏此前在阿拉善SEE担任秘书长多年，非常熟悉怎么与企业家理事们互动。

“去李连杰化”之后，落差很快显现出来。2011年7月，壹基金在理事会讨论确定新的机构战略之前，处于战略调整期，在救灾和儿童领域推行了一些试验性的项目。在战略调整前后，机构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一名离职员工告诉《中国慈善家》：“壹基金本应向国际化，但目前跟一般的小基金会没什么区别，好像脱离了前瞻性。”而另一位新进入机构的员工则表示，“对于公募基金会而言，取信公众，就需要扎

实的落地项目。好的公益项目是基金会生存的基础。”

在王振耀看来，壹基金公募化后迅速“去李连杰化”，需要进行一些反思。“李连杰希望做大壹基金，希望壹基金离了他照样做。根据我的判断，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还是需要个人的人格化影响，李连杰还得经常代表壹基金说话。从目前来看，‘去李连杰化’是要付出代价的。”

5月11日，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杨鹏对“去李连杰化”的说法作了正本清源：“公募化后，李连杰发挥作用的定位有了调整。李连杰是著名影星，是壹基金的创始人、永久理事和重要力量来源，出席壹基金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公众活动，他的一些特别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他参加每年两次的理事会，决定年度规划和预算。他没有退出，只是不再介入具体的微观管理，而是继续发挥创始人、代言人和理事的作用。”

一名前壹基金员工则对壹基金的转型表达了不满：“转型前之所以做平台型基金，是因为筹资、公关、宣传是壹基金的强项。现在丢了优势去捡芝麻，路就变窄了。壹基金转型以后专注于做项目，但这不是它擅长干的事。”

无论众说如何纷纭，商业精英参与治理、专业团队执行、公众志愿参与的壹基金运作模式，已初步形成。

人人公益

壹基金一直很看重公众参与。其“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初衷，就是为了激发更多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杨鹏看来，一名企业家捐赠100万和100万名普通人每人捐赠1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

壹基金六年成长史，其实正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缩影。在不断壮大自己的同时，壹基金也在积极培育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对中国社会的公共事务，大家这就不满意，那不满意，其实背后缺的就是‘人人公益’。公共领域过去被国家垄断，好人好事有，但跨区域、跨家族，组织化的好人好事没有，不是一个自治社会。”杨鹏分析说。

为了建立一个专业化发展基础，从2011年1月到7月，壹基金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战略规划。参照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合作伙伴贝恩咨询提供的相关数据，7月15日，壹基金公布了“一个平台+三个领域”的新战略，并确定了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三大业务领域。

为了能在救灾时发挥及时、专业的救援作用，壹基金非常注重灾难救援的准备工作。据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介绍，壹基金积累了大量救灾经验。目前，壹基金平均每周启动一次救灾工作，每天都在进行救灾队伍、物资的调配。此外，壹基金建立了系统的备灾仓库，对于易贮存却很难一次性大量采购的帐篷、棉被等物资进行定时定量采购，确保灾害发生时能满足突然出现的庞大需求。

壹基金设有专门的灾害管理部。汶川地震一年后，李连杰在汶川宣布成立壹基金救援联盟。三年时间内，救援联盟从成立之初的30多支民间志愿救援队伍，发展为现在的近300支队伍、近5000名成员的规模，分布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另外，联盟还吸引了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近80位行业专家志愿加入，其中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培训部培训师、卫生救护培训师、120急救中心专家、高校心理学博士生导师，以及天文、气象及地震专家等，尽量让救援队伍更专业。

据杨鹏介绍，芦山地震救援中，以上联盟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是紧急搜救，壹基金救援联盟共投入搜救队员168人，帮助了21名重伤员、50多名轻伤员。目前仍保留20名搜救队员，应对不

断发生的次生灾害。二是联合救灾的900名NGO伙伴和志愿者，配送救灾物资。可以说，在民间公益组织中，壹基金是组织投入救援人数最多的公益组织，也是最有力量完成救灾物资配送最后一公里的组织。”

基金会的透明度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早在2010年，壹基金就发现，财务管理是草根NGO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如果不能做到财务透明，就很难取信于捐赠人。会后，壹基金委托北京恩友开发出两个财务信息透明的软件，并对NGO组织提供培训服务—就是在此时期，发生了“郭美美事件”。同时，壹基金还聘请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担任审计工作。壹基金进入芦山地震灾区救援时，就有审计人员随行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海京表示，壹基金的操作模式非常透明，有很多方面值得红十字会借鉴。

对于公益慈善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作用，李连杰有深刻的认识。2010年，他在谈及自己的公益理想时说：“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喜欢结构上的改变：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人的思想在改变，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每个公民都能担负起时代的责任。”

杨鹏也向《中国慈善家》分享了一个案例。2011年，壹基金为云南某地流浪儿童发放助学资金，一位上海的捐赠人不放心这笔钱是否会用到孩子身上，便向壹基金索要了受益人名单，并亲自飞往昆明，再辗转到达贫困地区一家家检查。结果发现，50个孩子中有两个没收到现金，而是被人代签领取了。经过

壹基金的二次调查之后，壹基金给出了答复：“签字人是孩子的老师，因为生病住院，所以没发到孩子手上。”并对当地合作方提出了发放流程的整改意见。这位先生认为该解释很合理，查证之后又向壹基金捐赠善款十万元。“他这一趟花了四天时间，但一圈走下来，他真的一个公民了。”杨鹏说，“捐款过程成了公益精神的训练过程、公民意识的培养过程。”

尽管寄托着成千上万人对公益的期望，但壹基金仍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实力偏弱的公益组织，其未来的道路依然很漫长。杨鹏坦言，现在的壹基金时时在压力之下，“自主捐款、有选择性捐款的时代到来了。也就是说，壹基金成为民间第一家获得公募资格的基金会之后，公益世界开始进入减少垄断的开放时代。每家机构的压力都上升了，壹基金也不例外。”

5月7日晚，参加完壹基金一届七次理事会的李连杰，现身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会场，并向公众透露了理事会对于2.6亿元善款的使用规划，“理事会正研究如何有效利用，预计今年会投入8000万元，剩余物资大约用三到四年的时间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每一个劳动者都参与，才是壹基金渴望的公民力量。”李连杰补充道。[网址链接_http://www.icixun.com/2013/0607/1351.html](http://www.icixun.com/2013/0607/1351.html), 2013-6-7) ●

壹基金从愁合法身份到愁钱

作者_未知 来源_慈讯网

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壹基金，作为中国首个由民间发起的、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它不得不更早地面对更多的问题。

李连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壹基金脚下的中国慈善事业这条路，还停留在黄灯状态，壹基金选择在黄灯下不断探索。

最头疼的问题

身份，曾是一心想做公募的壹基金最头疼的问题。

2004年12月26日，印尼8.9级大地震。2005年1月，劫后余生的李连杰在为拯救东南亚海啸灾民发起的筹款活动中，决定发起成立“壹基金”，倡导每人每月捐款一元钱。

但当时的李连杰并不清楚，要成立面向公众募款的基金会，政策上面临不小的难题，这个难题最终导致壹基金在2011年前都与公募基金的身份无缘。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壹基金要成为公募基金，就必须到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并找到一家业务主管单位。而按规定，业务主管单位只有

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国务院授权的组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才能担当。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前的几年时间里，壹基金经历了三次身份的变化，差点夭折，但幸运的是，它最终在众多寻求成立公募基金会的民间组织中脱颖而出并成功地存活下来。

2007年4月19日，申请公募基金受阻的李连杰，把壹基金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在红会内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下简称“壹基金计划”)，合作期限3年。由于壹基金计划可以分享红会的公募权，李连杰的全国公募梦想得以迅速实现。

壹基金计划成立一年后，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只有13个人的壹基金团队开始了救灾工作。当时，所有的救灾物资都是上海分派出去，但那时候的壹基金在上海甚至连一个办公室都没有，团队只能在现任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租的房子里办公。

汶川地震期间，壹基金收到了1.2亿元的捐款，送出了无数个物资包裹。红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壹基金这是一个婴儿在做大人的事。

成立之初，壹基金很大程度上借鉴红会的工作制度和标准。从如何接收物

资，到跟志愿者签什么样的协议，再到物资分配程序，壹基金一直在向红会学习。

但是他们也发现很多东西适用不了，“那个时候红会做的项目设立的 workflow，我们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流程很长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学习。”

同时，作为二级专项资金，壹基金计划没有独立账户，在操作上，捐款首先要进入红会总会的账户，这导致其在公益项目的执行上面临很多障碍。

为了减少实践中的困难。2008年6月，壹基金找到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希望能够在上海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但是由于公募基金会必须要找到挂靠单位，所以只能申请成立私募基金会。

当年7月，壹基金提出申请，两个多月就出了结果。10月，非公募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上海壹基金”）成立，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从此，壹基金计划和上海壹基金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有公募权的壹基金计划负责筹集善款，然后拨付给有独立执行权的上海壹基金，并由后者执行对外资助的公益活动。

然而，这让壹基金与上海市民政局、红会的相处关系越来越尴尬。那时候，李连杰和他的团队已经意识到，长久之计还是取得独立的公募权，即将壹基金独立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

2009年底，壹基金与红会的三年合作协议即将到期，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

一颗种子

2010年2月杨鹏加入了壹基金担任秘书长，在此之前，他是非公募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组织的秘书长。

杨鹏加盟壹基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求注册为公募基金的可能。

杨鹏起先希望壹基金可以在民政部注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但从2010年2月到9月，为了找到业务主管部门，杨鹏到处“求医问药”，却仍没有结果。杨鹏说：“第一个民间公募基金会，做起来没有先例，都比较谨慎。”

李连杰也一度打了退堂鼓。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壹基金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存在“中断的可能”。

时任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看到报道后，刘润华立即找来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他问马宏壹基金登记有没有什么法律障碍，马宏回答没有任何障碍。

马宏之所以能如此确定，是因为深圳早在几年前便在这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尝试，并已经实行了改革。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个推进深圳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的合作协议，协议里明确授权深圳市民政局可以直接登记基金会，而原来只有民政部和省级民政部门才有这个权力。

整个注册手续只花了7天时间。12月3日，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批准公募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深圳壹基金”）的注册申请。杨鹏当时觉得，成功来得有点突然，忙了快一年了没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办下来了。

规则之殇

“独立”两年来，公众眼中的深圳壹基金形象似乎越来越高：明星团队、民间公益慈善标杆、受企业家青睐、募款能力强大……然而，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并非从此一路坦途，相反，它一直在为一些数字所头疼。

2004年实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壹基金来说并非易事。在杨鹏看来，要

等到团队足够强大时，才能使用更大金额的善款，以保证项目运作的有效。

现在深圳壹基金运作以项目制的方式进行，每个项目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考评后，才会决定是否出资支持，针对不同项目组建单独的管理团队。

目前，深圳壹基金在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四地仅有不到40人的全职团队。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人才，尤其需要管理、财务、互联网、工民建等高端人才。然而，深圳壹基金却给不起、也不能给这些人高薪。

根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公益基金聘用人员的平均工资不得超过本地平均工资的2倍。要超过这个标准，就会取消免税资格。2013年，深圳平均月薪为4104元，深圳壹基金员工的平均工资就不能超过8208元。

《基金会管理条例》还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据唐艺蕾介绍，壹基金从2008年至今，除去重大灾难的年份，每年筹资为2000万—3000万元，如果按去年募款3000万元推算，壹基金今年的公益事业支出应不低于2100万元，而壹基金养人、管理费用只有210万。

210万够用吗？不够。前几年还能免费的场地、宣传等费用，因为提供者不可能长期坚持，这一块的成本正逐渐增加，壹基金只能争取到一些公益价格。

而那些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公司跳槽来这儿的人，从前能拿20万—40万年薪，但到了壹基金，薪水都要打折扣，哪怕是高级经理月薪也不超过1万元。有时候，为了招到更多的人才，壹基金不得不和应聘者商量，20万元的年薪掰成两份，一人一半。当年，唐艺蕾进壹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情况。

唐艺蕾说：“10%相当不够的，除非明年裁人，不然的话就得集体减薪。”

其实，壹基金也有一个节省人力成本的方法，他们管好钱，执行让别人做

就行了。但这属于比较理想的情况，并不是壹基金现在的状况。在很多救灾项目中，壹基金不仅是一个资源整合方，也是执行方。所以这个决定了壹基金人数少不下来，钱也少不下来。

“现在中国老百姓还是喜欢直接执行，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给了你钱，然后你又给别人，那为什么我不直接给他。”唐艺蕾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壹基金现在要走执行的路线。

今年芦山地震救灾期间，深圳壹基金38个全职工作人员，联合了4个救援队近百人参与生命搜救，44个民间救灾伙伴的70个工作人员与近千名志愿者共同协调物资发放。

现在深圳壹基金的合作伙伴有450多个，但负责项目的人一共只有20个左右，每个人平均负责数十个项目，这几乎就是在特别高压的情况下在走钢丝的运营。

今年是唐艺蕾在壹基金的第五个年头，这些年来，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打仗。“国家的规定和外部的环境给你的作为的空间、合作的空间非常有限，必须要靠绷着自己才能撑着往前走。”（[网址链接](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6/21/26652422_0.shtml) http://gongyi.ifeng.com/linian/detail_2013_06/21/26652422_0.shtml, 2013-6-21）

“一个玻璃组织，没有任何秘密” 壹基金为何能赢得公众信任？

作者_梁为 来源_时代周报

深

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这家正式注册才两年多的公益性基金会，由于在雅安地震中的表现，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与地位。

自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至今，壹基金已收到善款超过3亿元，远超排名第二的中国红十字会的1.8亿元。

如果把中国公益界比作一个江湖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下称“红会”）说，公信力的缺失正在动摇它的“盟主”（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语）地位，壹基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仅仅两年前，壹基金还是一个挂靠于红会名下的基金项目，没有身份，账户不能独立，如今，却成了“倒逼红会改革的一股力量”。

为什么壹基金会获得民众那么大的信任与支持？

崛起于雅安地震

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成员包括李连杰、王石、马云、柳传志等名人的微信群活跃了起来。

这个微信群里包含了壹基金著名的11名理事会成员，他们中大部分是当

中国娱乐界和商界的大佬。理事会是壹基金的决策层。

20分钟后，理事会的决策传递到执行部门壹基金秘书处，壹基金启动了雅安抗震救灾项目。

不到两个小时，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四川山地救援队到达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壹基金另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救援队，则将第一批物资—3000件纯净水—送到了灾区。

壹基金能如此迅速行动得益于其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所建立的庞大救灾网络。救援联盟与救灾联盟被称为壹基金的“武网”与“文网”：“武网”由全国250多家救援队组成，“文网”则由位于四川、贵州、云南等10个省的200多家民间NGO组织构成。

当天上午，壹基金的工作人员与救灾联盟队员便将位于四川、贵州、陕西三地备灾仓库的物资运往雅安。

这些信息通过壹基金的官方微博、李连杰的微博以及众多企业大佬们的微博在网络上直播，传递给千万“粉丝”，点燃了他们的捐款热情。

“粉丝们”通过电话、银行转账，或者通过支付宝、拉卡拉、财付通等电

子支付手段向壹基金捐款。

雅安地震发生24小时之内，壹基金已经收到捐款1500万元。而此时，红会仅收到捐款16万元，以及十几万个“滚”字。

不过，壹基金并不愿看到这样的对比。壹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王石在微博上写道：“雅安地震救灾仅仅依靠壹基金远远不够，不应该因个别事件，失去对红十字会、对传统民政系统赈灾期间所发挥作用的信任。”

壹基金传播副总监姚遥则说，公众对公益基金会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情绪性，是不是透明，不是通过某一个事件，而是通过它运作的模式与规则。

但对比已然发生，并贯穿于整个雅安地震的救灾过程之中。这是中国公益基金会两种不同模式的对比。

邀请商界大佬加盟

2007年4月，李连杰与红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为了执行该计划，2008年10月，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所签协议的合作期限为三年。

这时的壹基金仅仅是红会名下的一个基金项目，捐给壹基金的善款都先流进红会的账户，再由红会拿钱出来做项目。

受困于资金使用模式，李连杰一直谋求让壹基金独立，但几年间碰尽钉子。其时，中国尚无民办公募慈善基金会获批的先例。

2010年，在接受央视《看见》栏目采访时，李连杰对柴静表达出他的失望，说“与红会三年合同将满，壹基金

有死亡的可能”，引起轩然大波。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对时代周报回忆说，当时，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刚好看到了那期节目，不久后他向李连杰发出了让壹基金落户深圳的邀请。

早在2009年7月，深圳市市政府与国家民政部共同签署了《关于民政事业综合改革合作协议》，其中授权深圳可开展民间公募型基金会的登记。

2010年12月3日，壹基金在深圳登记注册，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公募资格的民间公益基金会。当时的发起机构为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每家发起机构出资1000万元。

壹基金取得身份之后，李连杰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众多著名企业家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进入理事会。

到今天，壹基金理事会中的企业界大佬有：柳传志、王石、马云、马化腾、冯仑、牛根生等人。

这些业界大佬们的加入在某种层面上构筑了壹基金的形象。李连杰说，公众相信这些拥有几十亿身家的人不可能贪污壹基金的善款；相反，在壹基金资金困难时，他们还能给壹基金捐款。而他们既然能管理好一个几百亿资产的公司，当然也能管理好壹基金。

为什么壹基金能获得这些大佬们的支持呢？

姚遥认为，主要原因是李连杰的邀请。在李连杰几年的坚持之后，壹基金的信誉和理念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二是这些企业家本来就想从事慈善，只是一直缺少一个更好的途径；另



“壹基金杯”慈善明星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办

外，他们也希望借此把自身的资本理念带进壹基金，实现他们人身的另一层价值。“并且，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共同管理之下，壹基金不会出丑闻。”

壹基金将总部设在深圳，并慢慢扩员，建立了一套从理事会、到秘书处，以及包括灾害管理部、儿童发展部等7个事业部门的垂直管理系统。

但是，在深圳注册与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是有区别的——在民政部注册，可以在全国各地开展落地公募活动；在深圳注册，则只能在深圳开展落地公募活动。

对此，杨鹏说：“局限就是，我们不能在北京实行落地募捐，但感谢网络时代，感谢电子商务时代，因为网络是没有地域界限的。”

成功秘诀：公开透明

在深圳壹基金总部办公室的一块板壁上，列出了壹基金2013年度的工作计划：支出预算为7000万元，收入预算6500万元，其中紧急救灾预算为300万

元。

每年年初，壹基金都会确定当年的规划与预算。壹基金有一个7人的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前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2008年之后的几年间，壹基金所收到的捐款呈逐年下降趋势。这是中国公益界的普遍境况，尤其是在红会的“郭美美事件”之后。

但这一切在今年的雅安地震中被改变。“在这之前，我确实有点悲观，觉得大家都不想做慈善了，灾情发生后，发现大家爱心还在。”杨鹏坦承。

为什么壹基金会赢得那么多民众的信任呢？

杨鹏说，那是因为壹基金透明的运作方式。壹基金的资金由招商银行托管，招商银行每年要出具托管报告，支出情况一目了然。同时，壹基金还聘请了全球四大律师事务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壹基金的资金使用受制于几个大框架，一是由理事会批准的年度规划和预算，二是预算执行过程中

的权限控制，200万—500万元的支出，要执行委员会及执行理事长批准，500万以上的要理事会批准，200万以下由秘书长批准。

除此之外，壹基金还在金蝶公司的支持下正在进行信息化工程改造。“这个信息系统已经在试运行，建成后，壹基金可以实现内外全透明，捐款信息、财务信息、决策程序、项目执行过程及项目评估信息全透明，这将可能使壹基金成为最全面透明的基金会。”杨鹏称。

杨鹏说：“你要把这些过程都透明的话，它是一个管理的革命。但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让壹基金成为一个玻璃组织，没有任何秘密。”

壹基金在成都的救灾物资转运中心负责人王磊在电话里向时代周报介绍道，对于每一件物资，从采购或接受捐赠，到转移仓库入库、出库，到县政府接收，再分配到乡镇发放到群众手中，壹基金全程跟踪，进行签字签收，并每天在网上公布物资的流向。

5月18日，杨鹏再度从深圳赶往雅安。他表示，壹基金在雅安的工作才刚开始，地震救灾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地震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建，现在壹基金已经花了1700多万，但更多的钱将花在灾后重建上。

“这个不能着急，灾后重建如何花钱还必须与大额捐款的企业商量，让理事会讨论决策，慢慢来，把钱使用好，不能辜负公众的信任。”杨鹏说。

倒逼公益革命

5月20日，壹基金总部会议室，几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忙于给雅安地震的捐赠者们开具票据。给每一笔捐赠开具票据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

截至当日，壹基金共接受了297万人次、超过3亿元的捐款，接受捐赠物资超过200万件。

对比之下则是公益江湖“盟主”红

会的窘迫。“许多像红会这样的公益组织，已内化为政府的一个序列，行政化严重。壹基金的管理方式是横向的联合，比较灵活。雅安地震中壹基金的突起，能促使红会等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改革。或许，壹基金的模式代表了未来公益基金会的一个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公益研究院王振耀说。

对于壹基金忽然获得的巨大信任与荣誉，杨鹏表现出一种忧虑：“我们的能力、素质能否支撑起大家的信任？”他坦承，壹基金的捐赠人服务还不到位，受益人管理还不够精细，“‘内脏透明’还没出结果。”

同时，对于外界质疑壹基金对捐款提取管理费过高，以及质疑壹基金工作人员的薪酬。杨鹏的回答是：壹基金遵守国家法律规定，提取的管理费不超过国家规定的10%范围，员工平均薪酬不超过当地平均薪酬的2倍。

李连杰也认为壹基金做得还不够好。他已经在2011年后退出了壹基金的管理，他最新的动作是，接受刚退休的马云的邀请，办起了太极馆。

李连杰说，既然壹基金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内核，倡导的是“每人每月至少一元”，那么，“既然几乎每个人都赞同壹基金的理念，可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只有几十万人参与（月捐），这是否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慈善方面的共同价值观与信念还没统一？”（[网址链接_http://news.ifeng.com/shendu/sdzb/detail_2013_05/23/25617626_0.shtml](http://news.ifeng.com/shendu/sdzb/detail_2013_05/23/25617626_0.shtml), 2013-5-23）

“为爱同行·壹基金2013健行活动” 正式启动

作者_未知 来源_人民政协网

近日，由壹基金携手多家机构举办的首届“为爱同行·壹基金2013健行活动”启动仪式暨活动体验日”在深圳举行。

该活动将公益理念融入到户外运动。参与者通过四人组队，在16小时内完成最远50公里的户外徒步目标，同时共同为公益项目筹集不少于1000元的捐款。参与团队在活动中除了在山野中健行，挑战身体极限，还需要共同协作，推广“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理念，筹集更多爱心捐款。活动借鉴了香港乐施毅行者的组织经验，将这一世界知名的户外公益活动落地本土。

为了配合活动户外山野健行的主题，组委会特别将发布会安排在仙桐体育公园攀岩场举办，并设计了一场“为爱同行”迷你体验活动，所有到场来宾在活动正式开始前通过抽签四人组一队完成约2公里的行走目标，通过团队合作享受在大自然中行走的快乐。行走沿途还设有“净水项目”的展示体验区，让所有人在行走过程中感受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更多在困境中的孩子喝上干净的饮用水。

本次为爱同行活动组委会秘书长马啸介绍，2013年度为爱同行将分深圳和杭州两站，其中深圳站将于7月20日在深圳市梧桐山一大望村—三洲田—马峦山一带举行，规模为1000支队伍共4000人。杭州站将于9月19日在杭州西湖风景区玉皇山一带举行，规模为300支队伍共1200人。每支队伍在活动中除了参与百里健行活动之外还肩负着公益筹款和推广大使的使命。

发布会当天，为爱同行官方网站正式启动并开始接收公众在线报名。（[网址链接](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528/c34948-21641463.html)_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528/c34948-21641463.html, 2013-5-28）

中国平安联合壹基金启动 “儿童平安”计划

作者_未知 来源_壹基金官网

4月20日，四川雅安七级强震震撼中国，地震当日，中国平安即宣布向壹基金捐赠650万元。灾后不满20日，中国平安联合壹基金共同发起的“儿童平安”项目于5月7日在北京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普及儿童减防灾教育、为地处灾害频发地区的儿童建立长远帮扶机制。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CEO马明哲、壹基金发起人及创始人李连杰以及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等出席启动仪式。

在本次雅安地震以及其他各类自然灾害中，儿童由于自救能力薄弱，往往是灾害中最弱势的群体。为了切实地减少自然灾害对于少年儿童的伤害，为灾区儿童提供安全教育及安全装备，中国平安与壹基金展开全面深度合作，策划、发起、推广并实施“儿童平安”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由壹基金聘请安全教育专家开发适用于中国灾害频发地区的儿童安全教育课程。平安通过自己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向偏远地区的学校推广该项课程，帮助师生们掌握灾难、意外发生时如何逃生、避险，减少损伤的技能；其二，中国平安捐赠灾难、事故发生以后的急救

设备、器材和应急物资，帮助师生们在面临灾害时提高自救能力。中国平安期望通过这些细小却实在的安全教育及必要的安全装备，在今后的两年中帮助9万名偏远地区的孩子在可能的灾难面前获得更高的安全概率。（[网址链接](http://www.onefoundation.cn/html/87/n-1987.html)_http://www.onefoundation.cn/html/87/n-1987.html, 2013-6-5）

袁岳说

红十字会的任何项目都应纳入独立评估，要有独立评估预算，还应建一个独立评估的公开招标，最后把评估方法及结果向社会公开。

红十字会唯一出路是建立第三方评估

作者_常红 来源_人民网

近日，媒体曝光，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简称社监委）委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承认为零点为红会做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网民认为，这种利益关系不是普遍定义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应有的关系。社监委的独立性由此再次引发质疑。

5月27日，袁岳在微博发表声明，称决定退回所有委托款，并请辞社监委委员一职。为何要辞去社监委委员职务，退回前期合作款项是否迫于舆论压力？对当前面临信任危机的中国红十字会有何建议？中国公益机制应如何改革？近日，人民网记者对袁岳进行独家专访。

监督人言行应经得起推敲 反省自己所担当的角色

人民网：为何请辞社监委委员职务？

袁岳：公益监督工作非常敏感。在受邀出任红会社监委委员期间，我所在公司承接了红会项目评估的技术支持工作，社监委角色与评估方法支持项目之

间就有了媒体与公众提出的“瓜田李下”之嫌。

网友提出的质疑是有合理性的，所以我才会提出退款，或考虑是否适合担任此职位。网民认为我的角色有冲突，我不辩白，我接受他们的意见，这方面会反省自己。

在6月9日社监委委员会全会上，我将正式提出这件事，向委员会报告本次项目的合作情况，接受委员会对此问题的判断与意见。如果大家认为我不适合担任社监委委员，请委员会提交全会提出动议，有必要我本人将辞去社监委委员一职。

从个人来讲，既然我参与了社监委监督红十字会，作为监督人的言行应经得起推敲，如果大家对我存有争议或非议，我应对自己对所担当的角色有所反省。

从专业角度来讲，任何一家社会公益机构委托我们做评估的话，可能这样收费就没有什么问题。仅仅是因为我做红十字会的社监委委员，所以零点机构



收取红十字会的费用就成了问题。如果任何一家公益机构请我做监会或监事，同时我们又有合作，可能也会引起异议。

人民网：退款是否迫于舆论压力？

袁岳：作为专业调查机构，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是公益类项目，无论是红十字会还是其他公益组织，这样收费仅仅是成本。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自己也会成为网友质疑的对象。

为何退钱？零点从不从公益机构身上赚取利润？因为这是我们为红会提供的公益服务，一开始我的认识没有提到这个高度，但即使是公益成本费也应考虑周全一些。我们在商业服务方面挣钱，在公益服务方面是不挣钱的。

社监委不听从红十字会 我们没有人是靠红会吃饭的

人民网：社监委相对红会是怎样的机构？

袁岳：社监委16位个体成员不听从红会，是松散群体，是独立的非注册机构。社监委是在红十字会邀请下形成的机构，这在法律上不成立。我们没有人是靠红会吃饭的，也不会因为红会领导

一句话就要为其做什么。我们不是接受命令，而是提出建议。

红监委成员各有特长，刘姝威是财务方面，我本人是在社会调查评估方面，王振耀是在政策层面，每个人都在某方面某领域有所研究。我们从专业角度对红会机构建设提出建议。

社监会成员动机是明确的，我们是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推动红十字会循序渐进地发展。我只是想为红十字会做点贡献。我们提出意见，红会领导会重视。这种影响尽管是比较小，但只要有一点点就值得。

社监委不具备完善的机制，但这些成员希望在评估监督红会方面做些事情，贡献一点智慧，没人想从红会得名声和好处，这不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专访国际红会代表：希望大家能够认可中国红会努力背后的决心

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 倒逼红十字会进行系统改革

人民网：红会该如何面对当前信任危机？

袁岳：红会包括其他公益组织，下一步关键是普遍推行专业的、独立的评估。全世界的公益都不是仅靠社会监督，专业评估才是关键，包括财务审计、专项成效调查研究，专业公益组织研究机构，针对性地对一些薄弱环节进行监督。

采购中间环节的猫腻，非专业监督员能看出来吗？红会应走专业化的监督机制。比如人民网前一阶段向社会征集三名社会志愿者担任监督员，只能看着买来的物资送达了谁，从社会监督角度，实质上作用不大。很多公司采购过程中是否合规，必须有专业审计机构来完成。不是拉了许多人参与了监督，这就是监督。因此我主张更专业的第三方监督。

自我感觉不错的公益机构，改革的积极性都不高。许多朋友不理解我们为

什么趟红会这池混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不指望通过红十字会变成名人，而是真正推动中国有价值的公益。选择红十字会正是因其身陷舆论漩涡，才有可能真正革新。如果红会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这将对中国的公益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人民网：红十字会当务之急应做什么？

袁岳：通过包括我们在内的努力，推动红十字会在有限时间内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以倒逼红十字会进行系统改革。

当前中国许多公益机构是没有评估的。国外的公益机构必须有评估，之前我们曾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过，他们的任何项目都要经过评估。我们曾参与过中国儿基会的评估项目，一旦有专业机构参与，他们就知道这是动真格的，中间环节就不能胡来。

红十字会的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应当改革。红十字会是大家争议最多的机构，有可能进行改革；红会是个庞大系统，就算上层领导想改，但下边推行起来不一定那么迅速和彻底；必须有专业机构进驻监督，让红会切实感觉到任何事必遵循正规程序运作，红会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红会改革，同时也能推动其他公益机构改革。

我们评估公益项目过程中发现最多情况是，拿着捐来的钱买汽车、买房子。真正的第三方评估只做该做的事。中国的公益项目，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方面是极缺专业评估监督的，特别需要加强。

我将继续推动以第三方评估监督红会公益项目，但我担任社监委委员期间及不担任社监委委员之后的三年内，零点将不会承接红会公益的任何项目评估工作。无论我最终辞不辞职，我希望此事一定要做下去。

人民网：您认为社监委能达到第三方监督职能吗？

袁岳：社监委目前还达不到这个职能。社监委成员为证明清白，我们不拿红十字会工资，我们不占用任何工作条件。但试想，如果想做好任何一个项目评估，没有投入我们团队是没法工作的。我们这次为红会做的项目是帮助做评估设计，包括测量工具、问卷以及请第三方评估时的选择和管理。我们还要把管理手册公开，让公益机构评估怎么做。

红十字会的任何项目都应纳入独立评估，要有独立评估预算，还应建一个独立评估的公开招标，最后把评估方法及结果向社会公开。假如做到这些，我这个红监委委员就是值得的。

红会系统不少人反对自评 应从争议最大的地方推进

人民网：红十字会接受您的建议吗？

袁岳：从红会邀请我们做社监委委员到现在，零点给红会做项目评估，红会则希望先做自评，即先自身查问题。这不是理想办法，仅仅是第一步的自评，红会系统里就有不少人反对，还是难以正视问题。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我们看来，很多自评都是表面文章，但专业评估，如财务评估，从财务报表上就能发现许多问题。

博爱家园项目因涉及挪用款项，是红会争议最大的项目。如果这些地方有所推进，其他没有争议的项目，应该是可以推进的。这是从根源处着手。

人民网：红十字会系统改革启动了吗？

袁岳：红十字会系统改革已经站在中国公益改革前沿。改革有了方向，但是方法并不清晰，需要外界专业帮助。

红会的财务审核，刘姝威委员曾就建议，财务报表应该怎么做，哪些事情要说明白。这在公司里看来是非常常规的内容，但在红会机构里就不是很清晰，这就是社监委委员应起的作用。

我们要做的是，推动其接受第三方专业的监督和评估，先让其在观念上接受，再从实践上推动。一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监督，促使其朝着正面方向努力。

应给红会“洗心革面”的重生勇气给予鼓励

人民网：公众应以什么心态对红会？

袁岳：从社监委角度，我们发现或了解红会的问题都会提出意见。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对红会严格监督，但也应给红会这种“洗心革面”的勇气给予鼓励。最近几位委员都受到了网民质疑，或许还有委员并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我们都会当面向会议说明，公开对待。

从我来说，我会一直努力。难得有机会让红会面临社会如此关注度，只有专业评估进驻，才能让公益组织向正规发展，让监督真正成为“门道”而非“热闹”。

公益项目透明化 公募基金会应向社会公众公开

人民网：您对中国公益机制建设有何建议？

袁岳：一是，期待无论官方背景与民间背景的公益基金会与公益机构，均应努力重视与完善公益项目的落地情况与成效评估，没有这样的评估，就意味着公益项目不是真正的闭环管理系统，就无法给捐助人以切实的交代；

二是，公益项目的专业评估需要投入，公益机构包括捐助人应支持专业评估，并预算出适当的评估费用。在国际公益项目管理中评估预算普遍占到项目总费用的5%左右，最多会到10%。没有适当的预算支持就很难支持持续的专业评估，这是现在大部分公益机构普遍缺乏的设计；

三是，评估应以第三方评估为主，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选择应不论项目规模大小应全面实行公开招标；

四是，作为公益项目透明化的组成部分，评估方法、时间表、结果均应全面向捐助人公开，如为公募基金会则应向社会公众公开。

新闻背景：四位被曝涉嫌与红十字会“有利益关系”的社监委成员

5月27日，媒体曝光，数千万汶川地震后善款，从红会账上最终被用于社监委委员王振耀任院长的研究院。王振耀回应称，“办院与李连杰关系太大但与红会无关。”研究院系由上海壹基金与北师大合作设立。王振耀28日回应，从美国回来，第一个礼物就是有人以记者名义编造谎言说研究院收到红会2000万捐款！看来当务之急是找这位所谓“记者”先生讨还从天而降的2000万捐款。

此前，媒体报道，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的公开身份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因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作为社团组织曾向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颁奖，联盟秘书长又担任红会社监委委员监督赵白鸽，一时引来众多关注。王永不断通过微博澄清自己“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恳请网友拿出证据，一经查实，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社监委袁岳也公开承认承接过红会的评估项目“取费6万元”。袁岳担任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其主体为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今年，红会发布《汶川地震灾区博爱家园项目终期自评调查报告》显示，该报告即由红会委托零点公司所做。

5月29日，据法制晚报报道，第四名红会社监委委员张勇被曝与红会有直接利益关系。张勇是“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表示，蓝天救援队是纯公益组织，不隶属于红会系统，也不存在人事安排一说，更无利益往来之说。（[网址链接](http://article.cyol.com/jingji/content/2013-05/30/content_8486608.htm) http://article.cyol.com/jingji/content/2013-05/30/content_8486608.htm, 2013-5-30）

何道峰说

各种各样的基金会都带着历史走到今天，都有不足，但我们要倡导以向善的力量来整治自己的内部结构，不要简单抱怨政府、社会，要从自己做起。

人们不信任公益 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的公益

作者_庄庆鸿 来源_中国青年报

难熬的中国公益组织眼下怎么生存？公益组织该怎样面对质疑？从汶川地震开始的赈灾中，公益组织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就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

公益组织的功夫在灾难之前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如果没有准备就突入灾区，后续一定乱七八糟。”何道峰说，“真正负责任的公益组织，功夫在灾难之前。”他认为现在的民间公益组织，首先是“不清楚时间段概念”。

在救援的“黄金72小时”，是政府统筹管理、专业紧急救援的时刻。“雅安山区道路狭窄，如果不控制NGO的进入，救援车队就进不去了。这时候，除了少数有专业救援技能的公益组织，大量普通民间志愿者不应该介入救人，要让出生命通道。与其瞎添乱，甚至给自己造成生命危险，还不如筹款筹物，储备灾民特别需要的物资。”

“黄金72小时”后就进入过渡阶段。“这时候就轮到政府放开通道，让NGO发挥作用了。但怎么发挥作用，也是一个大难题。公益组织必须知道，地震后第一时间灾民的需求是什么？两个月的过渡安置时期，灾民需要什么？3个月后转入灾后重建又需要什么？”

在雅安赈灾中，不少草根志愿者的第一反应都是开车送水、送帐篷，何道峰却反对这么做。“因为政府部门已经在这么做了，而且比你力度大、速度快，你的作用就微乎其微。”

他指出，草根公益必须学会“错位经营”，“要错开政府部门所做的事”。

比如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到了灾区，但没有跟风捐帐篷，而是建板房。等到一周后，政府部门开始大量兴建板房住宅，许多NGO也跟风而上，这时建材价格涨到了每平方米2500元。扶贫基金会就及时转向，从住宅退出，改建板房学校，“因为孩子们不可能两年在帐篷里读书，需要一个相



对稳定的学习环境”。

单纯从资金投入看，民间公益组织难以和政府部门相提并论。但何道峰认为，公益组织在一次次震后重建中，还有相当大的活跃空间。

玉树地震后，全国运送来的物资堆积成山。这时候，公益组织还能做什么？

“我们第一个捐的项目，是大棚蔬菜。”何道峰说。扶贫基金会瞄准了灾区每天都消耗大量蔬菜的缺口，给受灾村庄成立了蔬菜大棚合作社，供应整个灾区市场。第二步是拿出300多万元，支持一个村成立了运输队合作社。“因为灾后重建房屋会带来大量的渣土运输。”等到灾后建设基本完成时，这些村已经给全体村民分了5次红，换了客运车，成了当地的客运队。第三个项目，是给7个村建设农贸市场，让村民“同股同权”，收取摊位费。除掉工资后，合作社能给村民分红。“我们不只是捐款捐物，要考虑让当地居民自己管理自己，培育当地居民的成长。”

何道峰建议，芦山地震灾后重建可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民间组织在公布的规划中“认领”，或者在政府没规划到的部分里再去“错位经营”。

“每个公益组织要对捐赠人负责，必须挖空心思学习知识、思考策略。做公益不简单，只凭爱心是不够的。”何道峰说。

质疑不可怕

芦山震后，微博爆发了大量质疑和谣言，公益行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不少网民变得悲观或者无所适从：“再这样下去，哪个公益组织我也不敢相信了。”

但身为公益组织一员的何道峰，却不悲观。“当人们发问和质疑的时候，大家不要感到泄气和悲哀。”何道峰说，“因为所谓的不信任，不是针对某几个组织，而是不信任政府长期包办、垄断的公益行业。”

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信任”发生的深层背景——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城市人口超过了7亿。

“社会文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出现了政府管辖之外的公共空间。政府不能用垄断的方法管，要把这部分权力交给社会。”大量人口住进城里，教育程度提升了，信息的密集度增加了。这让更多公众开始追问：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目前，国务院政府行政职能改革方案已公布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在何道峰看来，此次赈灾中，民政部首次没有发动全国性的行政性捐款，也首次不指定捐给某些非政府组织，是“最精彩的两大改革，最大的历史性进步”。

“每个组织不要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效率。”何道峰说。“公益组织更要改造自身，满足人们的善心和对公共空间构建的需求。”

想改变国家，先改变自己

日前，由何道峰召集的“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正式成立，由参与芦山地震救援、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的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自愿加入。目前，自愿加入自律联盟的有29家公募基金会和13家非公募基金会。它们承诺将全程公布接受、拨付和使用捐款的情况，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监督，接受政府监管，承担一切相关法律责任。

“各种各样的基金会都带着历史走到今天，都有不足，但我们要倡导以向善的力量来整治自己的内部结构，不要简单抱怨政府、社会，要从自己做起。”

何道峰坦率地说，不可能单凭一个“自律联盟”解决公益行业存在的问题。“这不是道德的约束，这是我们专业的约束。目前加入的42个基金会能不能做好，我不能妄评。但所有的研究、咨询机构、媒体，每一个公民都是第三方。它既然加入联盟，公开承诺自律，落实到白纸黑字就要考虑被监督。我们可以察其言而观其行。如果哪家基金会做得不好，就是心口不一，不仅会被开除出联盟，更会遭到公信力丧失的打击。”

“作为公益行业的一员，我们想改变整个国家的公益慈善行业，但首先得改变我们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基金会，从自律联盟开始，迈出了改变自己的第一步。”

何道峰坦率地说：“今天，每一个非公募基金会，日子都不好过，这是应该的。”2010年郭美美事件以前，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捐款基本冲到了6亿元。郭

美美事件后，一下掉到两亿元。时至今日，扶贫基金会的2013年度目标还是3亿元。“虽然郭美美事件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募款的难处，但长远来讲有巨大的好处，就是揭开了公益组织中政府垄断的问题。那就是捐款一定要建立在自愿、明明白白的基础上，一定要建立在不是‘被慈善’、‘被募捐’、‘被人利用’的前提下。”

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财务问题饱受诟病，社会迫切要求它们的财务账目公开、透明。但同时，社会还不能理性地接受公益组织把一些捐款花在自身管理上，许多草根公益组织也出不起审计费。这一矛盾，如何解决？何道峰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靠“新的志愿者”。

“过去我们只看到搬运物资的志愿者，但忽略了志愿者的实质——都是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别人。现在社会还需要很多种志愿者，如财务审计、工程监理等等。”（[网址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3-05/29/nw.D110000zgqnb_20130529_4-03.htm) http://zqb.cyol.com/html/2013-05/29/nw.D110000zgqnb_20130529_4-03.htm, 2013-5-29）

郝帅&刘伟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中提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民间组织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作者_郝帅 刘伟 来源_中国青年报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月，由于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日”，孤独症患儿的妈妈温洪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举办论坛，又是要接待来采访的记者。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孤独症患者的关注度又逐渐趋冷。

2012年，温洪和另外4位孤独症患儿的妈妈一起创办了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以下简称“康纳洲”），希望建立一个专门为患有孤独症儿童提供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使得社会对孤独症的关注不止于一年一度的孤独症日。可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康纳洲在注册和运转时都遇到过诸多障碍。

其实，与温洪她们创建的康纳洲一样，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在注册时都需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而这样状况或许将得到改变。

温洪和她的同伴们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中提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

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希望这个规定能够尽快落实。”在温洪看来，《决定》中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规定，不仅能够使更多的民间力量进入孤独症儿童服务领域，其他类别的民间力量也能藉此机会成立社会组织，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缺失的社会服务

将面团擀成面饼，再用模具印出各种图案，最后放置烤箱烘焙成饼干……这一套制作饼干的过程在普通人眼中算不上稀奇，可对于患有孤独症的常常（化名）却是一次自我超越的过程。

从幼儿时就查出患有孤独症的常常，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如今，已经21岁的常常连简单的擀面饼、用模具都需要身旁的面点师傅指点才能完成。

“如果不为这些大龄的孤独症孩子提供技能培训，他们将来的生存都让人担忧。”温洪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像常常一样，在康纳洲接受烘焙技能学习的大龄孤独症孩子还有萌萌（化名）、芊芊（化名），一共有12位学员。”邹文说。作为康纳洲的创办人之一，邹文的儿子康康也是一位孤独症儿童。

在医学上，孤独症又叫做广泛性发育障碍，一般来说是先天的。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定义孤独症的三大特点是——社会性功能缺失、沟通与交流障碍、行为和兴趣狭隘刻板。

谈及对大龄孤独症儿童的救助，孤独症社会性康复教育专家甄岳来提到了两个“零”：孤独症的孩子长大后靠自己独立生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社会不接纳这些长大的孤独症孩子，有的孩子之前所做的康复训练的效果就会退回到零。

“大龄孤独症孩子从学校出来基本都只能待在家里，很少有单位愿意接收他们和正常人一起工作。”温洪说。

相关报道提到，目前为止，中国孤独症康复机构有500多家，而据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自闭症患儿数约为164万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培训机构很少，大部分都是民间公益组织开办的，因为对于孤独症的了解，没有人比我们做家长的更了解，更上心。”邹文说，在她看来，公立的康复机构在数量上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才迫使他们这些家长合力开办民间康复机构。

公益组织面临的困境

全国500多家孤独症康复培训机构中，多数是民间组织的康复机构，而民

间组织的康复机构，往往面临注册难的困境。

据温洪介绍，民间组织康复机构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任何身份的“黑户”。

邹文也告诉记者，成立一个民间孤独症康复培训机构要面临两个难题：一个是注册；一个是维持。很多民间康复机构如果到民政部门注册，相应的申请身份通常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据现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我们国家对社会组织进行双重管理，就是说，想成立一个社会组织的话，需要同时有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这样一来就挡住了很多民间组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告诉记者。

温洪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康纳洲起初也是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了找到“婆家”，温洪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幸运的是，去年7月，温洪找到了接受他们的业务主管单位“北京市海淀区残疾人联合会”。

尽管康纳洲在民政部门得到注册，但更多的民间组织依然徘徊在民政部门之外。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所长王名介绍，“由于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很多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就是没有注册成“民非”身份的孤独症服务机构，作为中国第一家孤独症服务机构创办人

的田惠萍，也是无奈从事民间组织服务的。她的孩子在3岁时查出患有孤独症，由于当时社会对孤独症了解不多，公办康复机构则又是空白，在照顾了孩子5年之后，田惠萍决定自己成立孤独症康复机构，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没有哪个单位愿意给星星雨做业务主管单位，最终，田惠萍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登记开业。

“我们是第一家民间组织的孤独症康复机构，但因为目前的身份需要每年向税务部门交10万元左右的税，这对我们来说负担太大了。”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执行主任孙忠凯说。

此前一直建言改革我国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王名认为，“社会组织准入的高门槛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没有登记注册，这些社会组织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挂靠主管单位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不可取的，解决注册难就要修改这个政策。”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政府要创新管理体制，降低成立社会组织的门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双重管理审批制度正在逐步放开，但是现在只是提到了几类组织，并不是所有类，少部分放开了，实际上很多组织还是在实行双重管理审批。对于已经放开的几类组织，还没有落实到程序上，应该加快落实的进度。

民间组织期待政府购买服务

除了身份问题，民间康复机构面临

的共同困境就是何以维持。

康纳洲从开办资金到日常的运转经费，目前为止全部由5位妈妈自掏腰包。

“康纳洲的场地租金每年要16万元，加上给教师开工资，为孩子提供服务，一年下来的成本要40万元左右。”邹文说，“而我们的服务除了电脑班收取极少的费用之外，基本没有来源，全是几个妈妈在往里填。”

成立更久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也面临着生存难题。星星雨执行主任孙忠凯对记者说，星星雨的场地租金加上14位特教教师的工资，一年下来要80万元左右，收取的服务费用只能填补一半开支，另一半则靠社会捐助。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们会想办法维持下来，因为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孤独症服务，北京公办的孤独症康复机构目前有20多家，而民间的康复机构则有100多家，从服务的专业能力上衡量，很多民间组织的康复机构比公办做得还要好。”孙忠凯说，“我们每年给200位家长做教育培训，很多家长都在排队等着上课，现在孤独症康复机构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了。”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主席团副主席王新宪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像康纳洲这样的民间孤独症康复机构，对于孤独症康复市场起到补充、弥补了政府对于这个领域服务的不足。他呼吁，社会各方面爱心人士要给予民办机构更多的支持，当然也包括政府方面。

“政府和社会应当共同承担未来的社会服务项目，政府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资金保障，社会组织则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院长王振耀表示，“在香港，政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大体为400亿港元，其中有100多亿港元是直接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事实上，在孤独症领域内，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出资购买社会服务。孙忠凯介绍，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主办、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一期自闭症人康复指导员培训班去年就已经开班。

“星星雨为参加培训的康复指导员提供15个工作日的专业培训，其中4名学员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4家康复训练机构，朝阳区的4名学员将享受朝阳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免费培训名额。”孙忠凯说。

与星星雨一样，康纳洲去年也争取到政府部门36万元的购买服务项目，为孤独症教师提供培训。“尽管这笔钱全部用来培训教师，对康纳洲本身的运营没有资助，可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一次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更多的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帮助康纳洲运营和发展。”邹文说。

“政府购买的是属于政府责任内的公共服务，但是不直接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政府提供资金，以购买的形式购买民间公益组织提供的服务。”贾西津说，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谈及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贾西津认为，竞争性的购买还比较少，直接选定购买对象的类型比较多，也有很多购买是政府把资金转移给政府建立的社会组织，钱从左口袋转到右口袋，这

不是一个合法的购买形式。

“问题是购买服务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务购买不在政府采购体系里面。”贾西津为此建议，把公共服务购买纳入到政府采购法里面是一个最现实的途径。因为按照现在的标准，政府购买是指购买项目、工程、服务。而服务是指政府内务需求，不包括公共服务购买，因此，在法律层面应完善政府采购的内容。

“作为残联来说，一方面争取政府的购买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扶持民间组织；一方面对民间组织进行规范指导，服务规范化才能争取到政府购买。”中残联教育就业部一位人士说，“两者结合才能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网址链接_http://zqb.cyol.com/html/2013-05/23/nw.D110000zgzqnb_20130523_2-05.htm](http://zqb.cyol.com/html/2013-05/23/nw.D110000zgzqnb_20130523_2-05.htm), 2013-5-23）

谭红波说

企业基金会的发起设立者首先必须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基金会发展成一个优秀、伟大的基金会，就需要保持其独立性，而不是企业或企业家的附属品。

如何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

作者_谭红波 来源_公益时报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至2011年，企业及企业家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有285家，占非公募基金会总量的22.3%。这些已有的企业基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其资金来源于支持其设立和发展的企业，所以其日常运作绝大多数时候都要唯企业马首是瞻。

如何能充分利用企业基金会的资源优势，使之成为公益慈善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一，企业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明明白白将企业和基金会各自的责任义务弄清楚，不要含糊其辞。首先，在发起设立基金会时，企业应确定好基金会的宗旨，需多费一些心思和时间想明白基金会成立以后要做什么，集中关注哪些个领域；其次，在基金会成立初期或发展过程中，企业应出资支持日常运作及在宗旨范围内开展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再者，企业需帮助基金会实现“独立”：如果企业希望基金会在成立之后，能够实现资金从企业“断奶”，就

需要企业（家）帮助基金会逐步实现这个目标——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帮助基金会培养专业、独立的资金运作团队，逐步实现资金的投资增值。

第二，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基金会要充分尊重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基金会的资产不应该被政府用作其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补贴，尤其是他们不能是捐款的直接受益人。如果企业基金会做不到这两个方面，总是跟政府保持着很暧昧的关系，甚至有很多利益瓜葛和牵扯，那么就很难独立、健康发展，更别奢望成为卓越、优秀甚至是伟大的基金会。

第三，建立独立、务实的理事会。现在有一些企业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多由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或来自某些与企业有利益关系的单位的人员担任。这样的理事会成员组成至少可能带来两个不好的结果：一是非常强势固执，完全用管理企业的那一套思想来（下转52页）

陈友华说

对今天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来说，我们不应该总是沉浸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责与无限争吵之中。对历史的追责，为的是更好地面对未来。

独立第三方监督与公益组织的成长

作者_陈友华 来源_作者为本刊特约供稿

一、独立第三方监督如何促进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健康成长？

引入独立第三方机构，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对于促使其公开透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中国的各种组织都是在一个讲究人情关系的传统文化熏陶下，甚至在严重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下被“培育”起来的，“适者生存”的逻辑自然使得各种组织多少带有这个社会的不良社会习俗的印记。中国目前缺少必要的独立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因而真正能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客观公正的独立第三方组织少之又少。

在如此社会土壤中生长的公益慈善组织自然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出现近期被媒体披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实属“正常”。目前各类组织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多经不起显微镜下的仔细观察。各种类型的组织在“适者生存”逻辑下更多采取的是“有奶便是娘”的竞争策略，所谓的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自然也概莫能外。

产权明晰与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第三方监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独立第三方组织开展有效监管的前提条件。因为监督者必须对产权人负责。但当下中国的很多组织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混乱，如果第三方真正独立、客观公正、严格地对其实施监督，如实向社会披露监管结果，无异于砸自己的饭碗。“经济人”假设与“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世界上又有几个人会与自己的利益为敌？众所周知的原因，所谓的“独立第三方”与被监督者“合谋共赢”现象并不鲜见，监管在中国多流于形式与走过场，监管失灵是当下的普遍社会生态。这不仅发生在社会领域，更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领域引入独立第三方监督已经历多年风雨，结果又如何？想必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例如，中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之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不时被曝光。证券市场尚且如此，其他领域可想而知。

因此，目前引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

构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促使其公开透明与健康发展是必要的，但仅仅依赖于此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如下六个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政府监督。政府不仅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政策与资源的供给者，更应是公益慈善组织运营的监管者。二是媒体监督。目前，在其他监管手段缺失或者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这一监督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三是捐赠人监督。这对捐赠人与公益慈善组织均提出很高的要求。除了大额定向捐赠的监督相对容易以外，其他类型捐赠的监督，无论是对于捐赠人、还是公益慈善组织可能都面临较多的困难，监督成本也可能较高。四是社会监督。关注、参与、监督公益慈善组织活动，是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五是行业自律。通过建立行业协会等组织，增强行业自律是促使公益慈善组织健康发展不可或缺之措施。最后，自律。公益慈善组织要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

二、独立第三方监督究竟能否帮助公益慈善组织重新赢回社会对其的信任？

在目前中国这片土壤上很难生长出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公正的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客观公正的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在中国当下少之又少。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异化的所谓“独立第三方”监管机构。中国目前的公益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多经不起显微镜下的仔细观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适者生存的逻辑，“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与“公益慈善组织”多采取合作的

形式，因而“你好我好大家好”与“小骂大帮忙”多成为“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向社会公布的对被监督者的最终监督结果，最终实现“中国式”监督下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和谐共赢”局面。因此，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通过所谓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督，促使其公开透明，规范运作，健康发展，从而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目前，中国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公益慈善组织实施监督的条件还没有完全具备。在此条件下，引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公益慈善组织实施监督的结果是：公益慈善组织在“他人在场”情况下的运营将逐渐趋于规范，其公信力可能也因此而逐渐恢复，甚至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作为监督者的“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声誉或公信力有可能因此而受损。为加强对红十字会运营的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最终结果很可能是：红十字会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漂白”过程，在由社会眼中的“黑会”重新回归到“红会”的同时，社会监督委员会也面临着“由白变黑”的极大风险。

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尴尬处境的必然性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均由专业人士或社会名流担任。就个人而言，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很强。但这些人不仅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且工作都十分繁忙，出任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一职都

属于尽社会责任、不取任何报酬的“业余兼职”。这就决定了社会监督委员会很难胜任目前社会与章程所期盼的角色：

一是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两大公益慈善组织之一（另一家是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业务庞杂，部分工作专业性很强，要实施对红十字会的有效监督，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并要求专业知识支撑。虽然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都是各领域的优秀专家，但也不是什么都精通。时间、精力与专业等限制，社会监督委员会要实现对红十字会运营的有效监督实际上是很难的，甚至根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是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的一个对外宣称是“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但社会监督委员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由于总免不了“内部监督”与“自我监督”的嫌疑，因而要完成“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的使命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三是监督需要被赋予权力。社会监督委员会是否拥有对地方红十字会日常运营与项目开展情况的监督权，有待法学家从法律上的详细考证。如果法律上没有授予社会监督委员会对地方红十字会开展项目的监督权，又如何监督？

目前，社会监督委员会就是否应该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本身，从媒体披露信息看，不仅社会监督委员会内部分歧严重，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热议。在社会监督委员会还没有正式作出是否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决定之前，就将内部讨论向社会公开，使社会监督委员

会陷入十分被动与尴尬的境地。

首先，郭美美事件错综复杂，仅靠“业余兼职”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去重新调查，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从实际侦查经验上考察，都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难以胜任的。

其次，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需要被赋权。不是社会监督委员会想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就可以重启调查的，而是需要被赋权。目前，不用说社会监督委员会，即便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都无权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而只能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要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

第三，国家相关部门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早有定论。如果彻查，结果无非三种：一是重新调查结果与官方原先定论一致。此时，重新调查的必要性等将面临质疑，社会对此重新调查结果恐怕一时也难以接受，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广泛讨论与争议在所难免。二是重新调查结果与官方原先定论不一致，甚至相差很大。这需要大量的确凿的证据。而搜寻确凿证据不仅需要敬业精神、专业知识、时间与精力等，更需要气魄与胆量，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推翻原先的定论也绝非易事。三是轰轰烈烈重启调查，草草收场。这种情况最可能出现。一旦重新启动调查程序，必然会引起媒体与全社会的极大关注，此时再想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也就变得异常困难。

无论最终出现哪种结果，均会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与广泛的社会争议，最终不仅致社会监督委员会于社会舆论的漩涡之中，而且使得稍稍平息的整个公

益慈善领域再一次陷入社会舆论的拷问之中，多责难而少包容则可能演变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的普遍社会生态，社会也因此被撕裂而不是团结，从而不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实际上，对历史事件的追问与反思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更好地面对未来。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恰恰是对历史的追问与反思。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一味地沉浸在历史事件的追问与拷打之中，而忽视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何谓历史真相？有无历史真相？历史真相有无还原的可能？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简单地用“是”或“否”所能回答得了的。胡适先生说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在中国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历史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有鉴于此，对今天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来说，我们不应该总是沉浸在对历史事件的追责与无限争吵之中。对历史的追责，为的是更好地面对未来。对当下的中国公益慈善界人士而言，我们不应再一味地纠缠于历史的争论之中而不能自拔，而应该勇敢地走出历史的阴霾，用公益慈善精神去弥合社会的裂痕，使更多的人重新聚集与团结在公益慈善的旗帜下，将人们的慈心善举充分地激发出来，使社会逐渐恢复与维持其良知良能，并向着一个“清明”与“仁

爱”的社会迈进。这才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

（上接48页）决策，使得执行团队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另外一个结果则完全相反，理事会形同虚设，完全听命于企业大老板，没有独立的思考和意见。

因此，企业基金会要独立运作，就必须建立真正独立专业的理事会，尽量避免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带到这中间来。理事会成员的构成应该多元化，但有公益慈善背景的成员在数量上必须具有优势。

第四，尊重专业。基金会的运作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要保持企业基金会的独立性，就必须相信并坚持其管理和运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只有吸引更多、更好的专业人才来参与设计、参与运作，才能使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具有基金会自身的特点，符合基金会独有的发展规律。

企业基金会的发起设立者首先必须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基金会发展成一个优秀、伟大的基金会，就需要保持其独立性，而不是企业或企业家的附属品。（[网址链接](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ZLxZL/201305/e9bb36ef4a864c7d8294d6328805929a.shtml) 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ZLxZL/201305/e9bb36ef4a864c7d8294d6328805929a.shtml, 2013-5-21) 🔴

王石：走到公益事业台前的行动者

不盲目的特性，及自我更新的强烈意识，贯穿在这位现年62岁男人的人生里，使他积累起企业家、业余登山家、公益人等多重身份。在一个“无关系不商业”的社会中，他高调提出“不行贿”，靠强烈的市场意识，打造起了全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品牌——万科。

作者_宋厚亮 来源_慈讯网

自从去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王石很少回国。2月底，他难得地回一次国，是为了出席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在论坛上，他演讲的题目是：自我更新。

他是一个不停地自我更新的企业家。61岁之际，在用十年时间由企业家“更新”为一个业余登山家之后，他再次自我更新为“哈佛学子”。他选择去哈佛大学读书，并非装装样子而已，他真的像年轻学子一样，非常认真地泡在哈佛校园里。

甚至私生活上也表现出自我更新的迹象。最新一次令王石攫住公众眼球的，是关于他离婚并与31岁女演员田朴珺恋爱的传闻。在这次公众讨论甚嚣尘上之际，他选择了得体的沉默。而上一次令王石成为超级舆论焦点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他关于万科员工捐款的言论，他被卷入公众舆论的漩涡之中，成为一个“国家危难之际逃避责任”和“为富不仁”的负面典型。那一次，他没法选择沉默，只好掩藏自己的本色，公开认错道歉，承认自己言辞失当，表

现“很青涩”。直到五年以后的今天，他才以不同的口气回顾那个事件，并表达对这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忧虑。

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的前夕，王石正抓住空隙时间阅读一本叫《模范公民》的小册子——这是1933年出版的国民初级小学生课程读物，由他的朋友邓康延重新加以整理后出版。这本小册子吸引了王石，在赶赴采访地点的堵车路上，他阅读的一篇课文是：《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

不盲目的特性，及自我更新的强烈意识，贯穿在这位现年62岁男人的人生里，使他积累起企业家、业余登山家、公益人等多重身份。在一个“无关系不商业”的社会中，他高调提出“不行贿”，靠强烈的市场意识，打造起了全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品牌——万科。至于2008年地震期间的“万科员工捐款10元为限”言论，在遭受大众狂批的氛围中，那种不随声附和、坚持量力而行的理性光辉，自然也遭到极大的忽略。

而经历了2008年舆论事件的反思



后，作为“公益人”的王石，视野更宏伟了，在社会改革领域里，他既有大胆的想法，也有积极的实践。

企业家应该推动社会改革

“在一个民族需要激情的时候，我说了句理性的话。”2008年汶川地震，万科员工共捐款200万元，王石发表言论，认为员工捐款应该量力而行，“以十元为限”。此话一出，犯了众怒，万科股价应声下挫。后来，王石亲自公开道歉，并且万科又追加捐款1亿元。

五年后再度提及此事，他的回答平静。“2008年我遇到那种情况，压力非常大，负面舆论大，心里想不通。但现在再回过头看，那个事反而比较简单。在中国做公益，公共空间本身不够大。传统的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一切，民间的公共空间很窄。现在到了公民社会，更多的公共空间由民间来做。既然是走在前面，言论对错是一回事，本身就会遭到质疑、误解。”

随着中国慈善界一些乱象的出现，

已经有更多人理解了王石当初的理性态度。但王石并未停留于此，他仍在反思自己，寻求自我更新的方向。

“改革到现在，政治改革由政治家、学者他们考虑和推动。作为企业家，现在又掌握着主流话语权，我们应该在社会改革上面进行推动。”王石说，“所谓社会改革，就是不但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还要体现公民的责任。”

“如何让社会更美好？我们是抱怨呢？是等着‘中南海’来决定、来改变呢？还是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如果每个人都做起来，社会自然就改变了。能力有大小，你尽自己的能力，你是企业家，当然要尽企业家的能力。不要更多地想着，这应该是别人做的，应该是上面做的。”王石说。

“我们每个人都一股涓涓细流。”喜欢登山也喜欢漂流的王石这样感叹。

财富得到尊重才有推动社会的热情

相较于30年前向美国学习市场经济

和现代企业的巨大热情，对于通过慈善手段推动社会改革，更多企业家的态度是犹疑未定。

两年前选择到哈佛大学留学的王石说，“就社会现状来讲，中国现在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他认为，美国当时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问题、贫富悬殊、污染和贪污腐化，这些社会现象和当前的中国类似。为了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美国的企业家担负起了责任。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富豪主动捐出财富，成立各类慈善基金会，推动社会建设。

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在21世纪呈几何级增长，他们是否会像洛克菲勒、卡内基一样捐出财富，并将其转化为推进社会改良的社会影响力呢？

王石并不看好，他说有待观察。个中最大原因是财富是否得到尊重。在美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常清楚；而中国则不然。

“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到底算谁的？这是很含糊的。当然，在法律上非常清楚，是个人的。但在观念上、本质上是很含糊的。当然，在法律上非常清楚，是个人的。但在观念上、本质上是很含糊的，就是个人的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个人财富没有得到尊重，那就不是他的，他考虑的就不是捐出去，不能没把握就捐出去。确定是他的，他才能决定捐或是怎样。”

2008年王石“捐款”言论事件所体现的公众对待财富的态度，令王石感到有些担忧。“大家对我的那种态度，那样的轩然大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该捐啊，你不就赚俩臭钱吗？现在国家有大

灾难，你不捐谁捐？这个逻辑很简单。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王石说，“所以企业家赚钱时战战兢兢，不会捐出去，而想办法转移出去。为什么现在有移民热？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2011年，福建的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捐出了价值35.49亿元的股份，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不仅在中国开创了股捐模式，也是捐赠数额最大的一位。但在王石看来，最起码在未来20年到30年间，像曹德旺这样做慈善的民营企业家只是个别人。

走到公益事业台前的行动者

与曹德旺这样的财富大亨相比，王石的财富就少得可怜，他从未登上各类富豪榜，仅仅拥有市值5000万元左右的万科股份。在参与社会改革的方式上，王石显然不会走曹德旺的道路，更不会走大多数企业家所选择的沉默应对的道路。

2004年加入阿拉善生态协会，是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试图参与社会改革的最早尝试。最初他是被创始人刘晓光拉进去的，门槛不高，一年交10万元会费，连续交10年。

在这个为内蒙古阿拉善盟治理沙漠化的公益NGO，王石的态度很快从消极转为积极。他对环保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经过竞选成为第二任会长，后于2008年卸任。

阿拉善生态协会拥有100多位企业家，既有大陆的，也有港台的。王石承认，参与这个组织，让他对公益有了较多的认识，尤其是从台湾籍会员身上所学甚多，因为台湾企业家有着更强的公

益文化和更丰富的公益实践经验。

从2008年“捐款”言论事件中，王石看到了他的社会影响力比他想象的要大，企业的影响力也比他想象的要大。反思之后，除了说话更加慎重之外，他开始更积极地扮演一个公民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仅仅知道赚钱的商人角色。此中，他找到了推动社会改革的感觉。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王石来到广州，在政府工作了短短几年，然后抛弃了铁饭碗，选择即将造就神话的深圳特区，扎进创业的浪潮。20多年后，他把万科带向了千亿元规模。如今，他推进社会改革的事业也选择在了这里。

2008年后，王石发起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会，接着又参与发起了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他承认，这与他参与阿拉善生态协会有着因果上的联系。

2011年1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立，宣告它从李连杰时代公募基金会旗下一支专项基金，转变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创始人李连杰功成名就，选择退隐。王石则走到台前，担任壹基金执行理事长，他还把在阿拉善协会的老搭档杨鹏一并找来，担任他的秘书长。在他的主导下，壹基金开始借鉴阿拉善协会的多年经验，在转型中阔步发展。此后，尽管在美国访学，但只要是一旦基金的重大活动，他都要专程回国参加，以示支持。

2012年7月，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成立，一个新的民间公募基金会诞生了。王石是发起人之一，担任基金会的联席会长。他表示：“我们现在

就要行动起来，不仅仅是保护深圳的红树林，还要保护浙江的、福建的、海南的、广西的，而且保护好我们的绿色环境，这是我们的行动。”

接下来，王石说，万科要成立一家慈善性质的儿童医院，已考察美国、泰国等国家。一旦建成，将是继李亚鹏成立的嫣然天使医院之后的国内第二所慈善医院。

王石对外坦陈，他这几年在公益事业上比较活跃。但他又表示，这样的身份有点尴尬，因为他是企业家，原本是公益事业的幕后人，却走到了台前，亲自推动着公益事业向前发展。

也正是凭借这种有点尴尬的身份，他才使人们得以看到，一个有心于推动社会改革的企业家，到底可以走多远。

在王石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企业家，以他为中心，以阿拉善协会、壹基金、红树林基金会为平台，推动环保，推进社会与环境的良性发展。

在王石行动的同时，也总有质疑的声音，认为他并没有多少贡献，反而获得了慈善家的名誉。他并不争辩，只是感慨：“也许我们改变外部环境的作用微不足道，但通过推动参与环保活动，我们改变了自己。”

做公益很难评价结果

王石——“做企业很容易看到结果，那就是利润指标。但是做公益却很难评价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坚持的过程，而结果却很难预料。”

如果仅仅是一个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即便再成功，王石也不会赢得如此的尊重。

喜好探险，去追求生命的极致体验是王石给世人的印象。当他以59岁“高龄”第二次从珠峰下来，他说深爱的登山运动已经告一段落，“在珠峰上左眼短暂失明，供氧不足。我想这是老天在告诉我，别再来登山了。”当他完成南极之旅后，人生开始了新的篇章，他把南极极点探险当成是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的结合点。结束的是探险活动，开始的是他正式的公益事业，他开始把基金会管理和企业公民当作自己的另一份重要事业。

新身份新开始

2011年伊始，王石有了新身份。

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揭牌仪式。至此，壹基金迎来了全新的一页，正式转为公募基金会。王石与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及柳传志、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牛根生、冯仑、周惟彦等企业家，以及周其仁、杨鹏等知名学者组成11人理事会共同管理深圳壹基金，在第一届理事会选举中王石被推选为壹基金执行理事长。

而万科公益基金会协助完成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注册，万科中心也成为深圳壹基金的注册地和办公地。

几乎在同时，王石表示选择了三年的游学计划。他自言人生的抛物线已度过了最高点，所以接下来的时光是让人们渐渐习惯一个没有王石的万科。

自此，2011年一直在哈佛游学的王石，回国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多半就和壹基金联系起来。他参加了壹基金召开的多次理事会。他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理事会表示，绝不获取一分钱报酬，不在

基金会报销一分钱，切实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救灾济困、解除苦难的慈善公益事业上。

在壹基金的多个创新中，执行理事会无疑非常突出。王石表示，“壹基金有一个和一般的基金会不同的管理，有一个执行理事会，这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明确了执行理事会有两年时间。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角色，要把腾讯管理方法、万科管理方法、招商银行管理方法揉在一块，来支持壹基金建设。”

越开越长的理事会

于是，有了王石和各位企业家的壹基金，开会的时间越来越长。

去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从早上9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引得理事之一的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都说开银行的理事会也没有这么长。因为每位理事对慈善领域的关注实在各不相同，大家的争论也格外热烈。

去年7月15日，在深圳举行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了下午两点多。他们就壹基金愿景、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等内容进行着热烈的争论。中午时分，闷热的深圳下起了细雨，但是会议室里谈论的热度一直未减。壹基金的参会理事李连杰、王石、马化腾、冯仑、杨鹏等对于壹基金愿景、战略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等内容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并进行最终表决。

随后，引发这些大佬们争议的内容曝光——壹基金宣布了其2011年至2013年期间“1个平台+3个领域”的战略模式，

即搭建一个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3个领域。根据壹基金未来3年的战略综述，在灾害救助领域，壹基金将关注受灾群体的需求，及时对重大灾害做出反应，向灾区提供救援，减少灾害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自此，壹基金有了新的方向，在2011年总收入1.0839亿元，运作117个项目，总支出7240万元。

灾后援建不留名

其实，相对于万科在企业界的发展，王石一直有着独立于企业家的公众形象。企业家王石，这似乎是一个显得不太恰当的称呼。滑翔、登山、赛艇，这是王石，但还不是全部。一个鲜少被提及的身份，是公益活动者王石。

2006年，王石在《道路与梦想》一书中写过：一个伟大的公司是没有故事的，比如可口可乐、比如IBM等。而在2008年，言论受到“双重夹击”的王石和万科都成了故事，被几百万条网络骂帖从“生命在高空”打回最低点。

此后，万科表示出资一亿元对重灾区之一的遵道镇进行援建。援建项目包括一所小学、一个医院和一个便民服务中心。但这不是“危机压力”，而是出自看到灾难后的震动。

“援建是不需要名字的。”王石说。今天，这些援建项目已经成为抗震建筑的参观点，但你不会找到一所叫“万科”的小学，尽管这是很多人的建议。

在壹基金之前，他是阿拉善SEE生态保护协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治

沙公益组织”的会长。在王石看来，“做企业很容易看到结果，那就是利润指标。但是做公益却很难评价结果，因为这是一个持续坚持的过程，而结果却很难预料。做企业可以一往无前，做公益需要包容、多元、理解，能让人学会很多东西”。(网址链接_ <http://news.foundationcenter.org.cn/html/2013-04/65972.html>, 2013-4-11) ●

爱德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其宗旨是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共同献策出力，开展同海内外的友好交往，发展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

爱德基金会(英文名称: The Amity Foundation)成立于1985年4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

本部在南京,所从事的活动有:对中国贫困地区派遣外语教师,以及中国最大的圣经印刷厂下属的爱德印刷公司等。爱德项目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年有数十万人从中受益。

组织宗旨

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共同献策出力,开展同海内外的友好交往,发展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

主要目标

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贡献;

使中国各界人民更广泛地了解中国

基督徒的积极贡献;

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沟通渠道。

爱德精神

1. 爱德基金会深信,中国的发展事业必须由中国人民起主导作用。

2. 爱德基金会的成立是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作为民间团体,爱德享有独立的决策权,同时积极寻求与所有致力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门或团体的合作,包括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专业机构、大专院校、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等。

3. 爱德基金会相信群众是实现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爱德在实施提高社区和人民生活水平各类项目时,强调群众参与的原则。

4. 爱德基金会优先考虑发展直接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帮助缺医少药、教育落后的穷困地区开展脱贫工作,促进生态保护。



爱德基金会紧急救援队授旗仪式

5. 爱德基金会为中国基金会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在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通过参与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为中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及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工作实践

爱德基金会是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其宗旨是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共同献策出力,开展同海内外的友好交往,发展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

自1985年成立以来,爱德本着上述宗旨,积极开展筹款活动,接受海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捐助,举办诸如教育、社会福利、医疗卫生、防盲治盲、农村发展、救灾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到目前为止,爱德共募集了8亿多元人民币的项目赠款以及大批捐赠实物,项

目区域覆盖了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引进外国文教专家与教师

1. 引进外国文教专家与教师1,800人次(每次时长一年),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服务。爱德基金会所聘的外教有1人获国家级友谊奖,近50人获省级最高奖。

培训乡村医务人员

2. 为缺医少药的边缘地区培训乡村医务人员16,000名和6,000名乡级卫生人员,配合世界卫生组织提倡的人人享有初级医疗保健的规划。爱德基金会制作的210集医学教育片获国家教委新闻出版二等奖。开展艾滋病的预防宣传教育活动、艾滋病人的关怀和生产自救项目。

开展综合发展项目

3. 农村贫困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脱贫的工作面广量大。爱德基金会在许多地区开展综合发展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建饮水项目600余个和灌溉站100余座,新开发耕地50,000亩,种植林木40万余亩,在农村



骆家辉参观爱德面包坊



壹基金基金会举办的为孤儿筹款活动

培训各种人员60,000余人,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82873人次。农村发展的项目直接受益人数达200万人。

全方位的康复服务工作

4. 残疾人事业方面,除手术治疗之外爱德基金会推动支具、教育、职业培训等全方位的康复服务工作,儿麻患者接受康复者即有1,404人。培训康复人员1,046人。被江苏省评为全省残疾人三项康复先进单位。我们资助近50所儿童福利院约8,000人。

培训眼科医生和眼保健人员

5. 失明人事业方面,爱德基金会培训眼科医生和眼保健人员6,100余名,在6,000,000人中进行了眼病筛查,资助派出了100支巡回医疗队,为180,000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复明手术。我们获得了国务院残疾工作协调委员会颁发的“全国助残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设立了大兴安岭奖励基金

6. 救灾抗灾方面,早在1988年爱德基金会设立了大兴安岭奖励基金,奖励在大兴安岭坚守岗位,为四化建功立业

有贡献者。近年来,我会对每年的主要灾害作出反应,先后主要资助了云南丽江地区地震、河北张北地震、1998长江洪水、内蒙和新疆雪灾、2003年淮河水灾等的救灾抗灾工作。

由于爱德在各方面的工作,1999年国庆期间,爱德基金会被国务院授予“民族团结先进模范单位”

教育项目

因为贫困,许多学校无力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设施;因为贫困,很多教师失去了深造的机会/甚至被迫离开了他们的职业;也因为贫困,跟随父母离乡谋生的外来工子弟只能在流动中勉强接受非正规的教育……爱德教育项目一直关注这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问题,并尽最大可能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 ◎资助溧水特困高中生生活费项目
- ◎资助甘肃省民乐县丰乐中学修建学生食堂等项目

- ◎西部特殊教育师资培训
- ◎溧水特困高中生项目 家庭寄养
- 项目
- ◎资助食堂项目
- ◎西部特教培训
- ◎重返校园
- ◎重建危校
- ◎薪火工程
- ◎爱德书库
- ◎暑期英语教师培训班
- ◎内蒙古高校艾滋病预防教育
- ◎爱德基金会西部师范院校领导人赴港培训班顺利举办
- ◎爱德基金会2007-2008学年长期外教项目
- ◎爱德基金会青年志愿者项目
- ◎2007年暑期英语教师培训班顺利举办
- ◎重返校园项目——发放助学款
- ◎“爱德基金会外来工子弟学校学生奖学金”开始发放
- ◎我会向五所外来工子弟学校捐赠篮球

- ◎来自外来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的问候
- ◎爱心人士雪中送炭,孩子感慨——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摸篮球

发展论坛

开展理论研究论坛

爱德发展论坛是爱德基金会联手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国内知名学术研究机构开展的理论研究“品牌性”论坛。

该论坛不定期举办,将学术研究与爱德项目实践结合,在学界与业界之间也架起了一座桥,一座沟通、合作和创新之桥。

2006年12月21日星期四,爱德基金会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开展了第一届爱德发展论坛。这是双方为探讨业界和学界优化合作的一次努力,论坛从NGO的角色、项目以及评估问题着手,围绕农村发展政策问题展开讨论。

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学界、业界、媒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与会者包括了来自江苏省残联、红十字会、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民政厅、南京“标点”栏目以及南京“零距离”栏目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等等。论坛分三个部分进行，分别由爱德的项目介绍、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报告以及互动讨论组成。

分享调研活动

爱德基金会首先分享了各个部门在各自领域所开展的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和难题。其近期在西四省开展的农村发展调研活动，点出了爱德自下而上式的工作理念和方式，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当前爱德西四省项目工作中村发展的需要和问题。而这些问题与随后的社科院社会政策中心所关心所研究的课题不谋而合。杨团研究员和王晓毅研究员都提到了中国当前农村发展进程中各部门权力扩大化、集中化的问题，农村公共资源伴随着新农村发展政策的开展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正是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学者共同关心、并希望尽可能通过研究改善的。而同时，这些问题也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基层工作中实实在在感受到并且不断投入和付出努力的。而事实上，爱德基金会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陕西洛川已经合作开展了关于农村医疗的试点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互动环节中，来自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提出了关于评估标准、关于改变政策的关注，为爱德发展的思考提供了很好的补充。

学术研究登高望远，联系历史、现实，可以为爱德基金会的工作提供很高

的理论框架和科学的发展方向。而爱德的工作事务，反过来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沃壤。双方的携手，是学者是业者乃至社会乐见的。爱德基金会丘秘书长提到了爱德的“桥”的作用，东部与西部、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桥。此次爱德发展论坛，在学界与业界之间也架起了一座桥，一座沟通、合作和创新之桥。

公益理念

爱德是一个以项目为基础的机构，由此爱德从小到大、由近至远发展起来。总结过去20年的历程，我们的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项目为本、雪中送炭

爱德成立以来，始终以满足基层百姓的基本生活生产需求为目标，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从建水井、电灌站、沼气等小型扶贫项目，到开展农林牧、文化、教育、卫生等综合发展项目：项目区从江苏为主逐步扩展到西部的大石山区、黄土高坡及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转变始终瞄准社会需求，始终把满足百姓群众的基本生活生产需求为第一要务。爱德本身也在不断迎接这些挑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诚信至上、专款专用

公益项目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其中惟有诚信至上。因此，爱德始终严格管理捐助资金，用好每一分捐款。我们要求实施地设立独立到银行帐户，单独建帐。坚持“说实话、办实事、办实事”的“三实”作风，不做社会无需要

的项目，以较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社会需要。多余或节余的资源如数退还，比如，我们退还的一笔款项仅185元人民币。正是这样的做法，爱德赢得了捐款人和价款单位的信任。诚信乃NPO的立身之本、生存之道。

多方参与、三个一点

对待任何项目，爱德始终坚持“三个一点”原则，即爱德支持一点、地方合作机构配套一点及受益群众贡献一点。实践证明，在我们的项目工作中，这个原则是行之有效的。通过这个原则，我们不仅动员了政府的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工作，而且我们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爱德决不大包大揽，造成受助方的依赖性。通过实施项目，爱德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脱贫致富、改变处境的主力军，成为主宰命运的真正主人。

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

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如果不及时着手解决环境与生态问题，使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是难以奏效的。基于此，我们在扶贫发展项目工作中不急功近利，不竭泽而渔，注重帮助贫困社区在满足基本生活生产需求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另外，我们的项目尽量开发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组织、自我发展的能力，以人为本，增强受助人的造血功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创新发展，三个参与

NPO的特点之一既是机构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爱德在引进援助资金的同时，

十分注重引进国外的先进工作理念和方法，充实我们的项目工作。例如，爱德将国际上采用的参与式方法介绍到国内社会发展工作之中，并是其处境化，提出了群众、专家和政府“三个参与”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参与式社区发展思想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整个项目的全过程，得到了项目区群众、政府的广泛认同和国际合作机构的充分肯定。

优化结构，强化培训

没有健康的机构文化，没有一支精良的队伍，再好的理念和原则也仅是空中楼阁，根本谈不上机构的发展和项目的拓展。因此，爱德特别注意员工队伍建设，提出了“三C”要求，即爱心（COMPASSION）、事业心（COMMITMENT）和专业性（COMPETENCE）。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爱德形成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梯队式员工队伍，为爱德的成长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我们新出了机构发展的另外“三C”要求，即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创新（CREATIVITY），希冀爱德进一步优化内部环境，从而保证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江苏南京市汉口路71号，210008

电话：025-83260800

邮箱：admin@amity.org.cn

网站：www.amity.org.cn

各方言论

榕树根公益项目：活动中心#进新房#8天倒计时。前天晚上，社长、副社长、妇女主任等拱引寨子精英齐聚我们活动室，共商26日进新房活动大计，全寨子男女老少齐动员，从迎宾组、炊事组、歌舞族、传统乐器组到后勤保洁组，任务已一一分配到人，会议持续到凌晨两点。这就是景颇寨子，你家的事，就是全寨子的事。

中国慈善家杂志：【朱哲琴：为中国文化传承做实事】#慈善名人榜# 朱哲琴：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成功举办了“世界听见”民族音乐寻访之旅，与“@世界看见”手工艺寻访之旅，累计行程4万多公里，采集音乐素材1千余首，民族手工艺样本16种，图片记录5万多张，影像记录超过2万分钟，推出了27集纪录片……

南方周末：【公益25年】198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金会管理办法》，是中国公益史上的一个节点。2008年，汶川地震促使民间公益突出重围，是中国公益史的“分水岭”。中国公益事业如何历经20年孕育、5年蜕变，成长至今？阅读南方周末公益观察并参与关键词猜想活动。点击参与：<http://t.cn/zTkQJJa>

长沙网：2013年5月18日(周六下午14:30)，邀你做客【华声沙龙】，让我们走进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 的精彩讲座与公益世界，跟随他的职业角度与专业深度，一起聆听《企业社会责任到全民微公益》。报名地址：<http://t.cn/zTDn9WD> @华声公益 @华声在线 @华声论坛官方微博 @三湘都市报 @Hi都市报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在杭州召开理事会，@大自然保护协会-马云 卸任阿里巴巴集团CEO后出任TNC中国理事长。以马云、@胡祖六 @张醒生 为首的大批TNC中国企业家作为理事齐聚杭州，关注中国环境保护。更难得是他们多带来了自己的子女，希望能催生中国未来更多关注公益的善二代。

刘玄奇：#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徐建中司长讲话。分享了“制定和实施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的价值和意义”，从国家战略高度谈了这个项目的价值。慈善事业发展将成民政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而行业发展瓶颈则在人才，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将成慈善司工作的重中之重！@DSI中国

爱尚微公益：#益站到底#【公益项目初审结果公告】经过为期3天的项目初审，@爱尚微公益项目孵化中心现公布入围终审的30个优秀公益项目，此次祝贺各个胜出的优秀项目及团队，没有入围终审的项目及团队希望完善项目策划，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和支持各项目的运营状况。爱尚微公益，你我同参与！中国梦，益起来！

DSI中国：#DSI长沙#DSI长沙·青年公益创业计划，是DSI中国青年公益创业计划项目在长沙的分支机构，简称DSI长沙，背靠组织为湖南大学滴水恩公益创业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探索并推动长沙青年参与社会创新和公益创业。DSI的含义为Discover Social Innovation，探索社会创新，亦即DSI的宗旨。

中国发展简报：【草根NGO叫板基金会维权】4月初至今，一起公益项目是否被侵权的事件引发公益界的关注。一方是草根NGO，一方是企业基金会。一项本能共赢的合作，为何反目？在以往民间公益组织遭遇侵权事件里，大多NGO无力反抗，放弃维权，如今禾邻社要启动法律程序，以期解决问题。我们拭目以待！<http://t.cn/zHcw2HR>

社会创业家：[创业学院]李志刚：社会创业的六个突破口 《社会创业家》2013年4月号 <http://t.cn/zHfurka> 公益组织规模的扩大通常会带来管理者角色的改变。当机构从一个人变成两三个人，关系变复杂，不仅要处理外部的关系，又要协调内部关系，这时攻克六个突破口尤其重要。

公益慈善论坛：失独家庭需要公益人的介入，有关的公益组织有必要转向这一长线的公益需求上。@一点通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公益人可与失独者共创养老模式 <http://t.cn/zHIUUTM> 失独者的相互关照甚至是彼此认同都没有障碍，公益人的进入，可以将失独者的诉求具体化为养老的模式探索。对失独者来说，这是好事，可以把对政府乃至国策的喊话，转变为可行动的方式。况且，要是施行得恰当，可以再拓宽既有的养老方式。

新联合公益基金会：《社会组织如何获得政府“订单”》1、仔细研究购买服务的相关文件，包括申请流程、提交资料的方式、截止日期、资金使用要求等，避免遗漏；2、确定“有亮点”的服务项目，如选择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服务内容要有鲜明特点，项目模式有创新性；3、项目申请书应简洁、清晰、易懂 <http://t.cn/zHbPK4m>

世界看见："明星慈善意义在于：取得成功和财富之后，用博爱胸怀来处理这些成功和财富，正确处理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明星"越多，我们的世界就可能变得越自由、美好、安全、幸福。" #2013慈善名人榜#正和岛创始人、@中国慈善家杂志 出品人@刘东华 讲话@MG美即面膜 @一号立井 @嫣然天使基金 @朱哲琴

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FTI排行榜

2013年6月8日 top25

作者_未知 来源_基金会中心网

网址链接_ <http://www.fti.org.cn/gm.html>, 2013-6-8

序号	代码	基金会名称	分数	本周排名	上周排名	涨跌幅	12周排名幅度
1	328031	爱德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2	231511	黑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3	321981	江苏省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4	319101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5	317691	上海宋庆龄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6	440801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7	339451	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8	108541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9	107591	中国扶贫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10	106531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序号	代码	基金会名称	分数	本周排名	上周排名	涨跌幅	12周排名幅度
11	106571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129.40	1	1	16—1	27—1
12	104181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13	100471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29.40	1	1	22—1	39—1
14	100621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15	102201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	129.40	1	1	70—1	143—1
16	10960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29.40	1	1	121—1	247—1
17	100461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18	51044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金会	128.20	18	29	137—17	273—27
19	101441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128.20	18	29	18—14	29—22
20	512051	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27.40	20	32	20—15	32—24
21	362661	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27.34	21	33	79—21	156—33
22	333621	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126.39	22	37	188—18	392—30
23	100701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126.33	23	40	654—23	1345—40
24	102281	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	125.20	24	41	24—17	41—31
25	102371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124.79	25	42	508—25	1090—42

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

作者_未知 来源_新浪公益

网址链接_ <http://gongyi.sina.com.cn>, 2013-5-20

排名	慈善名人榜候选名单	职业	2012年度个人捐赠额(10分)	2012年度个人间接募集(15分)	个人公益行动(40分)	个人公益影响(35分)	加权总分
1	王菲&李亚鹏	歌手&演员	1	15	35	29	80
2	李连杰	演员	1	15	34	29	79
3	成龙	演员	10	15	29	23	77
4	韩红	歌手	6	12	31	27	76
5	濮存昕	演员	10	3	33	28	74
5	朱哲琴	歌手	6	9	32	27	74
7	姚明	运动员	1	9	33	29	72
8	杨澜	主持人	1	12	32	26	71
9	崔永元	主持人	1	9	33	27	70
10	伊能静	演员、歌手	10	3	30	26	69
11	姚晨	演员	4	3	33	28	68
12	陈坤	演员、歌手	10	3	30	24	67
12	李冰冰	演员	10	3	29	25	67

排名	慈善名人榜候选名单	职业	2012年度个人捐赠额(10分)	2012年度个人间接募集(15分)	个人公益行动(40分)	个人公益影响(35分)	加权总分
14	王凯	主持人	1	12	30	23	66
15	李静	主持人	1	15	28	21	65
16	范冰冰	演员	6	9	27	22	64
17	周笔畅	歌手	6	12	24	20	62
17	陈伟鸿	主持人	1	12	27	22	62
17	黄晓明	歌手、演员	10	3	26	23	62
17	刘德华	演员、歌手	10	1	27	24	62
21	张国立&邓婕	演员、导演&演员	10	6	25	19	60
22	张杰&谢娜	歌手&主持人	10	3	25	20	58
23	李宇春	歌手、演员	1	3	29	24	57
24	范玮琪&陈建州	歌手&主持人	1	1	30	24	56
24	吴奇隆	歌手、演员	8	3	26	19	56
26	马伊琍&文章	演员&演员	6	1	26	22	55
27	羽泉	歌手	6	1	25	20	52
28	海清	演员	1	3	26	21	51
28	黄奕	演员	1	3	27	20	51
30	胡军	演员	10	1	22	17	50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 就“南京饿死女童事件”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

1、您如何看待发生的这一事件？怎样才能给予类似儿童更多的关爱，避免惨剧发生？

答：尽管导致这起惨绝人寰的悲剧的责任是全方位的，但主要还是由下列责任主体造成的：

首先，法院在对李文斌判决时，应视其家庭特殊情况，在如下判决中选其一：一是判决李文斌有期徒刑半年，但考虑到李文斌事实上成为两个幼女的唯一有能力的监护人，因而应该监外执行。二是判决李文斌有期徒刑半年，同时暂时剥夺李文斌与乐燕的监护人资格，另指定临时监护人，或者直接交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院暂时收养。但遗憾的是：法院只管判决，而对此判决对他人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未予足够的考虑。因此，在此次悲剧中，法院难辞其咎。

其次，居委会与民政部门罪责难逃。当地居委会和民政部门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主体的捍卫者，有义务及时向法院起诉这对父母并剥夺其监护权。但遗憾的是当地居委会与民政部门竟无视两幼女缺少有效监护人的监护，甚至当监护人李文斌的祖母丁春秀向居委会请求让孩子进孤儿院时，居委会不是主动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积极争取社会组织救助，而是予以断然拒绝。由此看来，当地居委会与民政部门不仅要向当事人、更要向全社会谢罪。

第三，民警王平元在整个事件中虽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未及时向民政部门反映情况，甚至向社会发出救援信号，因而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悲剧的发生凸显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存在的巨大漏洞，包括监护权的转移、救助、紧急处置等。保护儿童不仅仅是父母的责任，当父母不能尽责时，民政部门便应成为第一保护责任主体。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政府老是躲在后面，总是不愿站到前台尽在儿童保护中应尽的责任。

为了给予儿童更多的关爱与保护，避免类似惨剧的发生，首先应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各责任主体、特别是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中的责任给予明确的界定，增强其可操作性。

其次，应增强对社区安全的巡查工作。巡查不应仅局限在治安与安全事故防范方面，也应该扩展到未成年人的保护等诸多方面。一旦发现情况，应实施紧急救助，并立即向社区居委会、民政、公安等部门报告。

第三，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应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关心、帮助与照护。一旦发现紧急情况，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应及时施救，并及时向社区居委会、民政、公安等部门报告。



2、丧失抚养能力的父母（如吸毒、服刑、残疾等），他们的子女该由谁来抚养，责权怎样明晰？

在监护人不具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未成年人保护法》应有规定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转由民政部门自身或指派机构暂时承担监护责任。民政部门在暂时承担监护责任期间，应积极寻找相关社会组织或符合条件的家庭领养，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社会组织或家庭，应交由社会儿童福利院暂时收养，直至监护人恢复完全监护能力为止。

3、对于这样的群体，社会组织怎样介入帮助？

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应该经常深入社区居民中间，及时了解社区情况，向社区居民传播现代公益慈善知识与理念，发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一旦发现急需救助的对象，有能力的组织，应及时进行必要的施救。没有能力的或者超出组织工作内容范围的，应及时向民政、公安等部门与社会发出求救信号。同时，积极与专门社会组织联系，尽可能将案主及时转介给专门的社会组织，实施救助。●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陈友华教授 受邀在爱德公益沙龙进行演讲

应爱德基金会社会组织培育中心邀请，我院陈友华教授于2013年5月11日晚7点在爱德基金会南京总部多功能厅，为从事社会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作了一场精彩的演讲，主题为《中国贫富差距形成机制及其消解路径》，本次沙龙活动还吸引到周边高校的学子以及热心市民的参与。

陈友华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大陆正处在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凸显期，而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化解事关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甚至政权的稳固。在公平公正思想指导下的利益关系调整是社会整合、国家认同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唯一办法，也是中国大陆的唯一出路。陈教授精彩的演讲受到在场听众的高度认可，阵阵掌声让演讲一度进入高潮，各界朋友也纷纷提问，与陈教授交流互动，各抒己见。●



江苏省慈善总会领导莅临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检查指导工作

2013年5月16日下午，江苏省慈善总会副会长赵顺盘、黄翠玉、陆素洁、陶礼仁，副秘书长张伟新，办公室主任毛尚会，江苏省民政厅福善处处长邢和平等一行10人莅临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检查指导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方文晖先生代表社会学院对赵顺盘会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院的发展情况，对江苏省慈善总会对我院各项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随后，大家听取了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所作的《江苏省社区慈善超市发展状况与运营机制研究》课题研究成果汇报。●



《南京市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训班》 在南京大学隆重召开

2013年7月12日至13日，由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及中共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南京市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训班，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曾宪梓楼隆重召开。

为期两天的培训班师资力量雄厚，国内多位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受邀前来授课，主讲人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副院长方长春、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何文、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及免费午餐公益项目发起人邓飞、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苏皖市场公共事务和政府关系经理徐晓宇等。参与培训的百余名学员分别来自南京市各区社建工委系统、市妇联及各类社会组织。通过听课及与授课老师的互动交流，学员们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河仁公益研究工作坊 近期共召开五次研讨会

2013年5月至6月期间，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公益研究工作坊共举办五次研讨会，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教授、副院长方长春副教授等公益工作坊的指导教师，以及来自各院系的工作坊成员一同参与其中。

研讨内容包括《国外基金会研究》、《佛教慈善研究》、《公益热点事件研究》、《资本精神研究》等主题。指导老师与工作坊的成员们，共同就不同主题的研究方法、研究脉络、研究创新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研讨会后，会将讨论内容形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第十四期河仁慈善论坛邀请梁中堂教授做主题讲座

2013年5月9日晚18点30分，第十四期河仁慈善论坛暨河仁公益研究工作坊第二十四次研讨会在河仁楼118室成功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梁中堂教授应邀以《计划生育是一面明镜》为题做主题演讲。参与本次论坛的有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副院长方长春，以及来自各院系的同学们和周边兄弟院校的师生。

梁中堂教授认为，在传统社会生育是每个家庭的私事；在法制社会生育属于私权领域；而在现代国家，从联合国宪章到一系列国家公约明确规定生育的数量和间隔都该是由各个家庭自己决定的事情，属于基本人权。梁教授指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与人口增长相伴而行，现代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属于同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侧面，他以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等国数据为例，揭示出总人口增加与劳动就业人口增加之间的关系。讲座的最后，在场听众积极向梁教授提问互动，场面热烈。本次论坛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的老师、同学的踊跃参与。



第十五期河仁慈善论坛邀请复旦大学任远教授做主题讲座

2013年6月5日晚18点30分，第十五期河仁慈善论坛暨河仁公益研究工作坊第二十七次研讨会在河仁楼118室成功召开，复旦大学人口所任远教授应邀以《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为题做主题演讲。参与本次论坛的有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常务副院长陈友华、副院长方长春，社会学院徐慷副教授、郭未讲师，以及来自各院系的师生。

任远教授在讲座中，主要谈到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人口红利的形成和中长期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从人口红利到人力资本红利的必要性和实现路径；通过发挥人力资本红利应对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推动城镇化。讲座的最后，在场听众积极向任教授提问互动，场面热烈。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平面图





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河仁楼251室, 210023

电话: 025-89680964

邮箱: hrca@nju.edu.cn

网站: <http://sociology.nju.edu.cn>